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4年11月15日 第16期总第121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 121 期
教育专辑（二）

目录

【专稿】

季 焯 文革之初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色暴力”
——姜培良之死与“仇恨教育”

【评论】

唐 燕 关于北京女十中教师孙迪之死——给王友琴纠错

【校史】

王逸伦 编辑 合肥市第六中学校史——关于文革中的记忆

【述往】

刘海鸥 书声朗朗——培元小学拾英

刘海鸥 日记告诉我们（1958年3月——1959年7月）

【资料】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教学批判》编辑组 本刊评论员
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还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教改组 景山学校调查组
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据点 修正主义教育的实验田
——北京景山学校调查报告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教改组 国际政治系60级11名毕业生
怵目惊心的和平演变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革命联络站 触目惊心的复辟

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斗批改办公室 五、七战斗团
《高教六十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保护

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斗批改办公室
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职业教育情况介绍

【专稿】

文革之初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色暴力”

——姜培良之死与“仇恨教育”

季 烨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师大二附中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同志在二附中劳改队（也称“牛棚”）被一些红卫兵以及个别非红卫兵的暴虐分子打死。前后被打死的还有二附中青年教师、复转残废军人靳正宇，铁道干校党委副书记樊西曼。二附中副校长高云被打昏死拉到火葬场，半夜苏醒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捡了一条命”（自语）。二附中教导主任厉益森老师说：“我就差一口气，否则我就是第四个（被打死的）了！”

一、姜培良书记被打死

二附中田滨老师的丈夫赵文滔在其回忆录《伤害》一书中记述了事情的经过：

造反首先是从中学开始的，妻子工作的学校——北京师大二附中，在学校红卫开始造反时，高中班学生中出现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一派，同时也有反对这一论点的另一派。其实两派的主力都是干部子弟。红卫兵彼此争论，各不相让，并且由辩论发展到谩骂，后来前一派的红卫兵不太理智，追到后一派的红卫兵名叫曹滨海的家里造反。曹你是高级军官，母亲是铁道部干部学校党委书记，自然也不示弱，当时就一人在家，面对几个红卫兵，人少力薄，情急之下，抄起了菜刀，打斗中划伤了对方一个红卫兵，红卫兵伤者立刻跑出门外大喊：“杀人啦！杀人啦！……”一边喊叫，一边跑去叫人，要叫一批红卫兵来报复。

曹姓学生住的是铁道部干校的宿舍，宿舍里有人立刻就报警了。警察来得很快，来了之后，就把曹滨海带走了。

等到大批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赶来，找不到曹滨海，就先把家给抄了个稀里

哗啦，接着又去太平庄附近铁道部干部学校，把曹的母亲樊希曼（铁道部干部学校的党委书记）揪到二附中，拉到操场之后，宣布召开批斗大会。在一片混乱中，只听得红卫兵的首脑喊了几句樊的所谓罪状之后，就用皮带开始抽打。一阵皮带抽打之后，当场把樊打死了（后来听说樊是个资深老干部，曾参加过长征，周恩来认识她，从开始到打死，她一声没吭）。

也许是打得一时性起，接着把学校书记姜培良、副校长高云及语文老师靳正宇都拉到小食堂，并且责令教职工全部跪在四周，宣布了几句他们的罪状后，一时间皮带的啪、啪的抽打声，打人者的骂声，被打者呻吟声、惨叫声，在小食堂构成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跪在四周的教职工，尤其是女教师吓得瑟瑟发抖。一阵雨点般密集的皮带抽打后，书记、校长和一个教师已经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了。红卫兵说他们是装死，用冷水泼在他们头上、脸上。此时，还有人从食堂拿了盐撒在他们身上。后来有人说：“姜培良不行了，搞一辆三轮车来，把他拉到医院！”据说，三轮车在拉往医院的路上，有学生说他“装死”，边走边打，还没到医院，姜培良就完全停止了呼吸。¹

据说当时有人吩咐：“高云有高血压，注意点。姜培良没事，他身体好。”结果是“注意点”的，被打进了火葬场，而“身体好”“没事”的姜书记当场殒命。红卫兵施暴的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据说在死去活来中，惨叫声中传来姜书记微弱的呻吟：“小爷爷们，别打了……”“……我是黑帮……”

《伤害》这样记述在姜书记被打死前后，其他在场教职工的遭遇：

就在要把姜培良拉到医院之时，红卫兵开始拿笔记本逐个登记教职工的家庭住址，说是明天开始要挨门挨户地去登门造反。面对刚才小食堂中间那血肉模糊、泥水滚了一身的三个被打者不知死活那一幕，有的女教师，当红卫兵走到面前拿着笔记本登记住址时，早已浑身颤抖，牙齿上下磕打，战战兢兢，语不成声了。为此，又遭到一阵阵的训斥和责骂。

紧接着，又组成了牛鬼蛇神队，把一些女老师剃了阴阳头，男老师则用墨水涂成黑脸，极力侮辱和丑化。²

¹ 赵文滔：《伤害》（修订本）页157—158，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² 同上，158页。

我记得在1966年8月25日之前，我们班主任就已经被剃了阴阳头，副班主任作为姜培良的红人被戴高帽子陪斗……这次，应该是更普遍的、不论名目的侮辱欺凌吧。我们敬爱的亲爱的老师们，就曾这样被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施虐残害侮辱欺凌！在那个时代，在那个“革命”中！

二、红卫兵“鞭尸”

田滨老师当时没有在场，她是第二天到校才知道头一天的惨状的。因此，赵文滔先生从田老师那里得到信息有的不够准确。比如，赵先生书里说，“语文教师靳正宇被打了个半死，自料逃不过一死，回到家，用一条带子，把脖颈挂在门把手上，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向知情人了解的情况是，靳正宇不是自杀。因为他怕被打死，从劳改队跑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自首，红卫兵就把他打死了。他不可能是上吊，因为不会放他回宿舍。

赵先生关于姜书记之死的叙述和我了解的基本一致。但我听说姜培良书记快断气时，跪在旁边的“牛鬼蛇神”队里的白胜喜给他做了人工呼吸。我去看望白胜喜老师时，就此事向他求证。

白老师说：“打死姜培良的时候，红卫兵那边有人喊说‘谁会做人工呼吸？给他做做。’当时我也没多想，就举手说‘我会。’”

“看着姜培良的样子，那时候我也不去想死活的问题了，今天死不了今天就活着。姜培良人挺好的，我得救他。”

白老师当过志愿军，应该是在朝鲜战场学会做人工呼吸的。红卫兵就让白老师给姜书记做人工呼吸。“他们让我给做。我做了半小时还是40分钟也说不清楚了。我怎么做他都没缓过气儿来，我就说：‘不行，我做的不行，还是送医院吧。’“红卫兵说：‘你说送医院，那就你送吧。’他们让我一个人送。我拉来辆排子车，把姜培良抱上车，拉到262医院旁边一个医院的分部，挺好的医院。送到急诊科。”

有人说，这个医院是四院分部，不知是不是北京医学院四院。“红八月”时，医院的大夫们对救治“牛鬼蛇神”怀着畏惧，大夫们急救了怕说救牛鬼蛇神，不急救也可能会带来麻烦。白老师说：“我把姜培良送进急诊科，让他们急救。

我也不知道他们急救了没有。姜培良死了。”

“姜培良已经死了，一个红卫兵还拿着一个棒子来鞭尸。”

“鞭尸”两个字白老师说得特别缓慢、沉重。

这个红卫兵不是干部子弟，是工人出身。白老师记得这个学生的名字，但他没说。

三、虐杀姜培良的，为什么是他们？

文革爆发，最先起来宣战、揭发批判、后来主事时残酷批判斗争姜书记的学生，多是被他特别精心栽培的、包括一些最早发展的学生党员；教师中，据说最早出来批他、带头高喊“打倒姜培良”的，也是之前最“根红苗正”、“最得力”、最受他重视的；而最终将他摧残至死的，也基本是他当政时特别着意呵护培养的“红五类”出身者。

卞仲耘（我初中母校师大女附中书记）、华瑾（男八中书记、我们院的邻居）……北京市文革初期死于自己学生皮带棍棒下的中学领导人的际遇，基本如此。

这是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想不明白。

最直接的原因是，姜培良从“党的化身”瞬间变成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牛鬼蛇神”。

随着“阶级斗争为纲”在1964年以后的通力有效推行，毛的无限权威与全党全民全心全意的效忠的态势已成定局。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敲响了北京市文化教育界（后来蔓延及全国各界）各级领导和所谓“反动权威”的丧钟。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长在讲话中说得很明白：“只要我们感到他是牛鬼蛇神，我们就要扫他、揪他，在这方面是没什么清规戒律的！”清楚表现出自上而下、挑动青年学生造校领导反的情况。

工作组撤了，最高领袖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把红卫兵放了出来，一时间，全北京市充斥着失控的暴力，姜培良们首当其冲。

在姜培良被迫害的过程中，他曾积极推行的“驯服工具论”“奴隶主义”毋庸置疑发挥了大作用。对于只会“听毛的话”、做毛的“驯服工具”的群氓（这

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遍现象，头脑简单的中学生更甚）而言，毛至高无上，是神；谁“执行资反路线”，谁就是反对伟大领袖，就是敌人就要打倒在地并“踏上一万只脚”！就像那时一首歌里唱的：“爹亲娘情不如毛主席亲”，“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即使像我们这些运动初起时的“保皇派”，一旦“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宣布姜培良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造校领导的反”，就即刻放弃了“誓死保卫党支部”的立场。

姜培良在二附中的偶像地位就是这样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

位高至刘少奇，尚遭戕害，遑论姜培良！

四、“仇恨教育”就是“狼奶”

我们还要思考深层原因。

当初友人的一句话使我如醍醐灌顶：学校应该施行爱的教育，可文革前学校施行的是仇恨教育——跟随全社会的潮流，“阶级斗争为纲”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句话——“对待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种仇恨教育，像有人说的，就是狼奶。它从根本上侵蚀被教育者的人性，塑造其狼性；这成为文革前的社会意识、行为潮流的主导。这种教育把青年人对理想的追求、积极上进、纯真、热情等优点，混杂着私念、无知甚至残忍等人性的弱点，全部纳入阶级斗争的筐里，变味为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简单狂热，缺少人山人海。而在当年的社会评价体系中，越如此越是“政治表现好”“思想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

这种教育给北师大二附中带来了这样的结果：一旦文革骤起，姜培良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成了反对毛的“资本主义当权派”，成了革命的敌人！曾被“阶级斗争为纲”精心喂养的、被后人称为“狼崽子”的，必反转过来说他。

问题是：为什么批判斗争姜培良的带头人和虐杀姜培良的主力的不是别人，而是本阶级子弟呢？

“阶级斗争为纲”，其基础就是依照政治需要，将社会撕裂为不同的阶级，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而各阶级的子女，自然成为“自来红”“自来

黑”与“自来灰”。

文革前“出身不好”的学生，少数内心很不满足于受压，但文革早期的主客观情势，都使他们不可能出头造反。而其多数则因为“阶级斗争”的观念原本就较弱，对“无产阶级的敌人”恨不起来，因此不可能成为带头人和主力军。当然也有极个别的“非红五类”，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性”而充当了打手帮凶。

“出身好”的子弟，对本阶级有着天然的情感，加之他们的“出身”，使他们占据了“人上人”的特殊地位。这种地位带来的优越感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使他们自然而然地“阶级感情强烈”行为大胆少顾忌；其中最早发展的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则需要表现出更强的“革命责任感强”、更坚定的“阶级立场”和更敏锐的“政治嗅觉”，加之他们原有的地位与威望，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运动骤起时，自然就成了带头人。当然，在他们中间，甚至于红卫兵中，由于天性善恶、理性程度的不同，在文革中的表现也有很大的区别。狼奶灌得越多的，狼性越足。那些最早起来揭批造反的，大多是通过特殊渠道、比普通同学更早更多地了解高层局势、因而更早被蛊惑的。早被蛊惑的早造反；狼性越强的咬得越凶；至于那些打人凶手，在“自来红”的滋养和文革中“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蛊惑及红卫兵为所欲为的情势中，最凶残的狼性被发掘出来，最终残虐无比以致杀人！

【评论】

关于北京女十中教师孙迪之死

——给王友琴纠错

唐燕

一

近年，俄罗斯发行了记录斯大林时代 130 万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生平资料的光盘；柬埔寨完成了对红色高棉在 1975—1979 年期间屠杀的 22, 000 多受难者的记录；以色列国家博物馆至今仍在征集二战期间大屠杀受难者的资料；可是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包括文革中的受难者，其姓名及生平至今没有完整的记录。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 —— 关于迫害、监禁、杀戮的寻访实录》一书记录了 659 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以“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部分填补了文革史的空白。虽然文革过去近四十年了，可是文革研究仍被压制，为文革唱赞歌的仍大有人在，王友琴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突破禁区，寻找缺失的历史，为文革受难者呼唤公正，难能可贵，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

二

三年前，我偶然看到了《文革受难者》中的《孙迪》篇，孙迪是我的母校北京女十中的受难老师，读后却发现文中所述严重失实。我知道王友琴“完全是凭一人之力独立完成的”这一“巨大的工程”，她的受访者大都是以底层和边缘的视角进行的口述和个人回忆，难免带有主观和记忆不准确的缺陷，文章内容失实在所难免。所以我没有太大惊小怪，我给王友琴写了封 email，纠正了她文中的错误，并把这封 email 发给了经常发表王友琴文章的国内某网站，请他们转给王友琴，结果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今年 1 月，我在“共识网”上看到了王友琴公布的她的 email 地址，便把她在《孙迪》中记述的种种不实和我所知道的女十中文革情况毫无保留地写给了她。可是她给我回复了一封 email，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又当即认真详细地回答了她

之后，她却不再理睬我，既不表态，更没纠错，令我大失所望。

我是女十中 1966 届初中生，当时就在学校。关于孙迪老师之死，我所知道的情况如下——

孙迪老师是 1965 年从北京 36 中调到我校的。1966 年 8 月的一天上午，她被 36 中的一伙老红卫兵揪走，说他在 36 中时曾“耍过流氓”，当天下午他被送回我校。孙老师是怎么被揪走的以及怎么被送回的我都没看见，我是傍晚时分看到他的，当时他躺在一辆三轮平板车上（不知那车是我校的还是 36 中的），那平板车就停在校门通往教学楼必经之路的路旁。当时他脸色苍白，毫无血色，已经昏死过去。他身穿白衬衫蓝长裤，衣裤上有点儿土不太干净，但没有血迹，并非王友琴写的“孙迪身上的衣服都被打烂打飞了”，当时 36 中的人早已无影无踪。后来他被我校师（生？）送往医院，不治身亡，记得说是因膀胱被打坏了。可以肯定的是：孙迪老师是被 36 中的而不是我校的红卫兵打死的。

1968 年春天，我校“四三派”曾联合 36 中“四三派”，并请孙老师的夫人参加，在我校礼堂为孙迪老师开过个追悼会；36 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孙夫人也曾到会发言控诉。这可以作为孙老师是被 36 中打死的佐证。

固然，打死孙老师的是无法无天的红卫兵，究竟是哪个学校的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孙迪》一文连把打死孙迪的凶手和打死的地点都搞错了，还写得那么绘声绘色，让人觉得太离谱了。

三

后来，我再次仔细阅读了《孙迪》，感觉王友琴对她所采访的我校一位学生的访谈资料，似乎没有进行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鉴别、分析和取舍，而是如该书的副标题“实录”下来了，结果该文不仅对孙迪之死的记述严重失实，而且文体结构混乱。

其中这段描写最不真实：“当时北京的街上常看到收尸体的卡车。女十中在大街边上。一名当时女十中的学生说，西城区开始大规模抄家打人的第一天，傍晚的时候，她在学校门口看到一辆大卡车驰过，卡车上结结实实堆满了尸体，可能有五六十具。后来，她又看到这样的两辆卡车，装的都是红卫兵在“破四旧”中被打死的北京居民。就在学校门口，她一个人总共看到了大约 150 具尸体。”

我在给王友琴的第二封 email 里针对这段实录问她：“您也生活在‘红八月’的北京，您觉得可能吗？”

诚如余英时先生在王友琴这本书的《序》中所言：“以史料的性质言，本书属于所谓‘口述历史’”。众所周知，口述历史的采访者对受访者的口述内容并不是简单的实录，采访者应具有较为厚重的历史背景知识，采访前要尽可能充分地掌握相关的文献资料，要对口述课题的选择、提问，受访者的确定等等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才便于与受访者沟通，易于对采访内容有准确的把握和透彻的理解。

史料学是史家治史的基础，一直受到史学界高度重视，以至于有“历史学者的任务就是整理史料”以及“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说法。研究史料讲究证据和理性，史料必须多方收集、不断质疑、反复核实，科学鉴别、严谨分析，尽可能做到孤证不立、无征不信。分析史料的过程被称为“历史批判”或“历史批评”，即对历史资料的提供者是否可信、史料本身是否可靠、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过程、结果等等与历史真相是否相符提出疑问，并作出科学的合乎逻辑的判断。如果材料不真实，绝不可被使用。

当然，要想在访谈中获取绝对真实准确的史料是不可能的，但尽量去伪存真，尽可能接近真实完全可以做到。

四

鉴于《文革受难者》一书涉及 659 人之多，王友琴仅凭一己之力“调查过的学校有 200 多所”，“和上千名经历了文革的人谈过话”，加上她对有些访谈资料不加分析和鉴别地实录，她书中有若干失实之处是必然的，否则才是不可思议的。

王友琴在书前的《作者说明》中说：“此书所记，仅是文革迫害的极小一部分。没有能写出更多的事实，作者请求死者原谅，也请求生者协助，以拓宽和深化此书的内容。”在她看来，此书没有“指正和纠错”的必要，而只需要“拓宽和深化”。

作为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对这本书会被指正和质疑本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应对那些诚恳的指正者表明一个更加诚恳的态度，并尽可能及时

纠错。对任何历史事件的叙述，不可能只有一个声音，而当有人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时，及时纠错才是最明智的。更何况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人人都处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都会受到监督和质疑，谁也不可能掩盖错误，更不可能垄断舆论。

王友琴在写于今年8月，发表于10月12日“开放网”的《文革研究掩盖在雾霾中》一文中说：“《文革受难者》出版十年来，这本书虽然没有走红畅销，但在读书界，不乏赞语，网上有时可以看到书的片段转载，或读者表示肯定的反应，没有明显的异议。”今年3月《南方周末》“声称这本书‘歪曲事实’。

‘歪曲’了什么事实？他们认为的‘事实’是什么？他们没有说。对一本五十二万字的、在大量调查访谈基础上写成的书，用三言两语给读者灌输一个结论，这种武断让人吃惊。至少，指控一本读者未有机会阅读的书‘歪曲事实’也显得相当奇怪。报导不能指出这本书的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不是事实，就作此断言，简单粗暴，这是一个大报应有的文风吗？”

看了这段说辞，她迟迟不给《孙迪》纠错就不再令人困惑了：一旦她纠了错，她所要求《南方周末》的，“指出这本书的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不是事实”不就不证自明了吗？显然，她也并未把今年1月我向她指出的，她把打死孙迪老师的凶手都张冠李戴了，以及那些孙老师如何在所谓我校被殴打致死的记述也都是不实之词看作是“明显的异议”。

我们知道，《文革受难者》还曾受到过其他人的质疑，比如有关她母校校长《卞仲耘》篇几年前就被她的校友明确指出有多个不实之处，后来还引起了她们之间的不愉快，怎么能说这本书“没有明显的异议”呢？

我还想提醒她的是：诸如她在《孙迪》里“围绕孙迪毒打他致死的，就有这‘十三红’（指我校十三位老红卫兵）”这样明确的却是不真实的指控，若是在美国，“十三红”如果起诉她诬告陷害，她是要吃官司的。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她应该懂的。

五

众所周知，王友琴虽然受到了不少如《南方周末》这类的“武断”和“简单粗暴”，但也赢得过从著名学者到普通百姓的很多赞誉，比如：亦虹女士说：“王友琴代表着揭露真相的力量”，“学术功力深厚，处理史料审慎”。《开放》

杂志的金钟先生则说：“作为出版者，十年来，我没有听到一个否定这本书的真实性的意见，相反，都是好评。当然，细节的出入，那是在所难免。遗漏更不必说。”

不像金钟先生这样把话说得多少留了些余地，著名学者余英时和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在为《文革受难者》作的《序》里极尽溢美之辞。麦克法夸尔教授还经过王友琴允许，把《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英文本“印进他在哈佛大学讲课用的读本里面。从那以后，这篇文章就一直被选课的学生阅读。每次都有数百学生选他的课。”

在这样的高度颂扬和荣誉面前，有人指出她写的并非都是真相，甚至有的叙述失实得还比较严重，已经被骑在老虎背上的她要想下来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我前面所说，像她的这种访谈和“实录”，有失实之处是必然的。其实，如果王友琴对她的书被指正取积极欢迎、求之不得的态度，并能及时纠错，只会给她加分而不是减分，她的形象会更加高大。

六

既然她对我的纠错置之不理、不认为我对她的远不仅仅是细节的出入的指正“明显的异议”，我该如何做？

奉行求真求实的史学精神跟她较真？抑或应该看重她的主流和大方向，维护她的光辉形象和声誉，对孙迪之死不再发声？还是为了避免成为她冠以的“文革事实的‘否认派’”而闭嘴？

中国传统史学历来重视史家的修养，汉代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中有《直书》、《曲笔》专篇，对直书予以表彰，对曲笔予以无情地鞭答；梁启超提出史家要有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西方人则说，要对历史怀有敬意。

只有历史是一面真实的镜子而不是哈哈镜时，我们才能以史为镜。尊重敬畏而不歪曲改写历史不仅是王友琴那样的“文革研究专家”，也是我等这样的草民乃至全社会都应该持守的底线。如果我为了维护王友琴的声誉而放弃维护孙迪之死的真相，我就违背了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就丧失了历史的正义。

七

我毫不怀疑王友琴费尽心力写《文革受难史》正是为了伸张历史的正义，我相信她不会愿意她的书留有瑕疵，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我宁愿相信她是愿意纠错的，只不过尚未进入程序。因此我建议她从核实那些被质疑的内容做起，对没有失实的部分勇敢坚持，对确有失误之处及时纠错，既给质疑者，更给受难者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无疑，这将是一个繁琐的工程，好在此书主要记述的是中、小学领导和教师中的受难者。文革初，目击到这类受难者如何被迫害致死的见证人很多，当年年龄尚小的中小学生们如今大多数还都健在，正如王友琴说：“我的书中所写的迫害、监禁和杀戮，并不是什么无从了解的秘密。1966年8月，拷打虐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地进行的。装运尸体的平板车和卡车在北京街上开过，连遮盖都没有，而被杀害的人，就是老师、同事、邻居甚至亲戚。这些暴行不像‘文革’高层领导人的决策过程或私人生活那样只有很少人能知道。”

长期以来，在国内做文革专门研究的人不多，这不仅因为这不准那不许，还因为其研究成果不能发表，不被认可，也就意味着研究者得不到相应的学术职称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结果“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在西方”。海外的文革研究者得天独厚，充分享有思想、言论、出版、交流的自由，没有禁区 and 障碍，更没有风险和后顾之忧，在如此宽松的学术环境下作研究就更应注重学术规范和学者风范，不辜负已有的荣誉。

收集、核实、记录历史不仅是历史学者的本分，也是我们每个文革人的责无旁贷和不容回避的历史的和道义的责任，无数真实的个案才能构成文革历史的宏观叙述。希望所有知情者能提供更多的资料，以补充、核实、修正《文革受难者》，这不仅是帮助王友琴，更是帮助历史和我们自己。

超链：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之《孙迪》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91c827c0102v5gf.html

【校史】

合肥市第六中学校史

——关于文革中的记忆

王逸伦 编辑

本文编者按：合肥市第六中学，是一所安徽省的省级重点中学。它始建于1954年，今年是它的六十周年校庆。同很多历史悠久的学校一样，合肥六中也经历了苦难的文革岁月。作为这所名校的校友，一位在读的大学生，我没有能力去收集文革资料，谨将本校校史中有关文革的大事记和少数当事人的回忆摘录下来，投于《记忆》，立此存照，供有心人的参考与研究。倘能为国人梦寐以求的“文革博物馆”贡献绵薄，余心足矣。

六中当年名“向阳”

1969年秋，文革渐渐由“停课闹革命”转向“复课闹革命”。金科（74届校友）终于得以从待了整整七年的小学毕业出来，按就近入学的原则进入复校伊始的合肥六中（1964年停止招收高中生）。那时的六中，有一个非常“文革化”的名字：向阳中学。

文革之中，时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大、中、小学校都要派驻工人宣传队。六中的驻校工宣队来自合肥农药厂，当年六中的校名的全称为“合肥农药厂向阳中学”。而合肥六中的校名则是在1971年恢复的，后来再未变过。文革中，合肥晶体管厂、合肥橡胶厂也曾先后派工宣队进驻过六中，但都没有再在校名前冠以厂名了。

那时的学校仿照军队的编制，班级称作排，三四个排为一个连，学校则称为团。金科在6连17排。当时全校共有7个连23个排，算起来，那时的六中的学生有一千多人。

然而，文革的第一波高潮已经过去，金科毕竟没有遇见那太阳最最红的年代。

读书无用正猖狂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五一六通知”。据校史大事记载，6月，根据教育部的通知，六中停止了期中考试（原文如此），改为民主测定成绩。7月到8月，停止招生，不放暑假，师生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学生开始贴教师的大字报，在教师中揪斗“牛鬼蛇神”，并在校内外扫“四旧”，图书室损失严重。在《校史》开篇的综述中，关于文革中的打砸抢，有这么一段叙述：

“1966年，学生开始扫四旧，图书室首先遭受严重损失。

1967年2月，造反派夺权后，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图书室、仪器室、保管室和校长室，都不止一次遭到打、砸、抢。大批图书被造反学生拉到废品站卖掉，广播器材被抢去作打派仗的工具，门、窗、桌椅大部分被砸坏。”

日出江花红胜火

据“大事记”记载：

“1966年9月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放假半年，停课闹革命”，学校党支部在学生中成立“红卫兵”总部，在教职工中成立“五保卫”组织。10-11月，师生中成立“造反”组织，开始批判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26日，省市委被夺权。2月，学校“造反”夺权，原党、政领导靠边站，“红总”和“五保卫”组织被“造反派”勒令解散。围绕夺权，学校教师出现G、P两派，三个组织（G派：‘八·二七’，P派：‘求真理’和‘三·二九’）”

据当时的教导主任盛芳青回忆：

“1966年秋季开始，停课闹革命，校内师生纷纷成立造反组织。当时合肥人对文化大革命有G、P两派（G派：安徽省革委会好极了；P派：安徽省革委会好个屁），我校师生中也有G、P两派。他们或在校内互贴大字报，打派仗，批斗学校领导和教师，把那些有历史或者其他问题的人称为牛鬼蛇神，统统关进牛棚，逐个批斗，或者组织去外地串联。我当时在学校虽然受到学生大字报的批判，但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牛鬼蛇神，所以仍要我负责红卫兵接待站工作，接待外地来合肥串联的红卫兵，安排他们的吃住。

1967年春，随着全国各地夺权浪潮的兴起，我校也被造反派夺权，领导靠边。我也参加了一个造反组织。当时我校教师中有三个组织，G派一个，P派两个。”

又据时任学校团委书记的吕厚芳回忆（1957-1969任校团委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运动学校没怎么搞，就查个食堂。文革开始时，工宣队进驻，各单位抽调来的。当时的组长董春龙，找‘重点人’（即审查对象），后来看不对了，不搞了。但是学生开始造反了。学校北面的工学院（合工大）大喇叭天天叫。学生开始八·二七串联，我们不让学生进校串联。六中学生（此时是初中生）开始自发写大字报，批判教师，三（3）班的一个学生是P派头子。六中是‘七七红暴’派，三中是‘八八红暴’派。我们是作为‘保皇’派被批斗。学生夺权，剪女教师头发，我也在大街上被剪头发了。他们说我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我还被戴高帽子游街，作为‘走资派’在食堂帮厨。游街的时候，工作组领着戴高帽的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我天天上班。学生把党支部抄掉了，把校长室的公章拿走了。教师是G派，学生是P派，搞得很厉害。‘大联合’的时候，让我搞学生指导员，我没干了。学生搞专政队，把一个老师搞死了。”

关于批斗老师，在校史综述中这样描述：“到1967年下半年，90%以上教师受到大字报点名批判，先后被揪斗的教职工达15人，他们有的被抄家，有的被关进牛棚。外语教师胡益咸（李鸿章的孙女婿）被迫服毒自杀，语文教师袁家芝（袁世凯孙女）在被抄家和揪斗后，生病死亡。”

“八八惨案”枪声急

《校史》多处提及了1967年8月8日发生在合肥的一次武斗，但是都只是极其简略地作了叙述。

《大事记》在1967年中的记录如下：

1967年5至7月，社会上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开始不断武斗，教职工开始离校，部分住校教职工，不分派别自发组织护校，防止“五湖四海”（传说中社会盗窃、破坏团伙）搞打、砸、抢。

8月8日，两派在我校和六安路小学之间发生武斗，双方用机枪、步枪对射达一个小时，死伤多人，后称为八八事件。八八事件后，大部分教职工撤离学校。

据教导主任盛芳青回忆：“1967年8月8日下午，在我住的六中宿舍楼与马路对面的六安路小学教学楼，G、P两派展开枪战。从此教师都跑了，不敢住在校园里。我则去公安厅的弟弟家避难，可公安厅也不安全，因为造反派要去公安厅抢军械库，我只好带着妻儿去了农村老家。”

在《校史》第81页，关于六十年来校园基本建设这部分内容中，对这件事的相关记载如下：“……新建两幢二层教师宿舍楼，被造反派抢作武斗据点。8月8日，合肥G派、P派两大对立的造反组织在此一度发生激烈枪战，造成多人伤亡。硝烟散后，该宿舍楼北墙留下累累弹痕。”

除此三处之外，便没有进一步的叙述了。值得注意的是，《大事记》中说了，参加这次武斗的是社会上的两派，并没有说是否有六中的师生参与。考虑到武斗的参与者通常是年轻人，包括大学生、高中生，甚至是初中生与小學生，不能排除有六中学生参与的可能，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不过，仅仅从《大事记》的“对射一小时”和“基本建设”中提及的“累累弹痕”来看，这场武斗还是相当激烈的。至于“多人伤亡”到底是几人伤，几人亡，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学到头来滚下乡

在成为向阳中学之前，合肥六中曾经被勒令迁到乡下。

据《大事记》记载：

“1968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66、67、68三届初中毕业生下放长丰县农村插队落户。

11月，市革委会决定：合肥六中下迁长丰县农村，分点办学。同月选定孔店、曹庵、徐苗三个办学点。

1969年1月18日，下迁师生开赴长丰县三个办学点，学校留守人员继续分校产和办理运输。”

然而这绝不仅仅是搬家这么简单。

此次下迁，有教师83人（这批人后来最终回到六中的只寥寥数人），同时将残存的教学、生活设备、器材一分为三，运到三地。

教导主任盛芳青回忆：“六中曾是市科技学校，图书、仪器、实验设备都很好，当时三个校长分到三个办学点，只好由我主持分家。许多东西都一分为三，

搞得不配套，另外在运输中损失损坏，实在可惜。记得有一天在操场摆着 80 多个橱柜分给三个点运走，被军代表看到，问这是干什么？我说，这些运下去是装图书、仪器的。他很生气地说，农村学校，可以在田间地头上课，在树上挂块黑板就行了。谁叫你们下去还搞‘修正主义’那一套？”

在分家期间，柜、床、桌、椅、图书、仪器，有的被私分，有的在运输中损坏，有的被农村干部、群众拿走。这样一个拥有近 5 万册图书，10 多万元仪器，教学设备齐全的六中，除了剩下几幢没有门窗的破房外，其他已经荡然无存。

长丰县各教学点的办学环境极其简陋，给当事人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据当时曾在长丰县曹庵办学点就读的校友黄同文回忆：“学校条件远不如我们上初中的学校，十几排很旧的瓦房，教室与教室之间靠碎砖、瓦片铺成的小路连接。那时学校还没有电，晚上自习只能靠几盏汽油灯照明。也没有自来水的概念，吃水、用水全靠一口机井，用辘轳摇着一桶一桶往上提水。最怕的是冬天，一旦房屋的玻璃碎了，也只能用报纸糊上，否则，只能任凭北风呼呼往里钻。寝室就更糟糕一些，40 多名男生挤在一间大寝室里，睡的是双层架子床。深更半夜的时候，什么声音都有，磨牙的，说梦话的，打呼噜的，……但同学们从来不讲究学习条件和环境，也没有什么差与不差的攀比，大家都认真学习着……”

由于仓促成行，违背规律，下迁运动自 1968 年始，第二年就草草结束。1969 年 5、6 月，下迁的学生全部倒流回城，并公开反对城市中学下迁的错误做法。结果，市革委会在 7、8 月份，先后在长丰、淮北召开下迁会议，对反对下迁的干部和教师进行批判和处分。10 月，市革委会强令将所有下迁教职工的户口、工资、粮油等五大关系迁到农村，留守人员撤离。而在这年 5 月，合肥农药厂已经接管校舍，秋季便办了向阳中学。

至于后面的事，盛芳青说：“我当时是六级教师，月工资 66 元，迁到农村后因为地区差，只拿 64 元。当时对反对下迁教师采取高压政策，我校教师江云，就因为反对下迁被开除公职。但错误的东西是不可能被人接受的，全省各市反对下迁的浪潮风起云涌。1973 年 6 月，各市代表在我校开会，然后去稻香楼与省革委会领导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接待我们最多的是当时的政工组长潘启奇，我们背后也有老干部支持，如合肥市老市委书记杨效春、教育厅长杨峰、中教处长王世杰等。他们要求下迁教师能争取逐步回城就可以了，不能‘一哄而散’而影

响到农村已办起来的学校。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上级终于承认下迁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同意下迁教师逐年回城。

六中下迁去长丰的三个办学点，以我所在的曹庵公社教学点出的人才最多。我们招的高中班学生有很多复员军人，他们素质好，学习努力，仅1973、1974届就有15人考上大学。据我所知，那几年由曹庵出来的学生不少人成了公务员或领导干部，如中央党校函授部主任黄士安，合肥市市委副书记、市人大主任黄同文，市政府发言人高晓光等等。

我是1975年7月上调回城的。当时市里规定，下迁回城的教师不准回到原校，怕他们继续搞派系，继续两派斗争。我分配到合肥十五中，任教革组长。1978年暑假，六中定为市重点学校，温校长要我，我才回到了六中。”

艰难困顿办教育

文革时期，教育成了学校最大的难事。如何在混乱中想方设法办教育，成了对学校最大的考验。

1970年，在农药厂的大力支援下，学校虽然逐步得到恢复，但由于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大搞开门办学，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学军，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使学生文化课学习受到严重影响。（见校史综述）这样的情况，直到温桢一来到向阳中学作校长，才有所改变。

温桢一是1970年从部队转业来的合肥。他来的时候，大批判还没有结束，好些领导都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批判“合肥的三家村”的时候，他也算是三家村的一个，大字报不得了。

他回忆当时的教学，说：“1970年我从干校调到六中。我不懂教育，依靠老师，学生也很好。我倡导学生做好事，不做坏事，不偷不抢，搞学习。那时候没人敢提学习。我那时候，抓教育、抓体育，六中奖状都贴满了。反革命、右派、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别的人不敢要，我要，要到六中当老师。我很重视‘文化体系’，所以老师只要有才，有点小毛病我都不在乎。”

关于当时六中的老师，英语老师李大中是这样说的：“当时合师院来到中学的一批大学教师，水平很高，教课生动；中学下迁回来的一批老师，当班主任教学有方；一批刚毕业于清华、北大、安大、安农、合师院等大学的年轻教师，很

亲近学生。我们有很多好老师。”

对此，74届校友金科回忆可以佐证：“教我们的老师大多原来是教大学的，主要来自合肥师范学院。据说是文革当中合肥学院解体之后，一部分教师下放到中学里来。这样的老师教我们这样的学生显然大材小用了。老师多很年轻，课讲得也很精彩，在那样纷乱的岁月里，能够在中学的校园里聆听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大学老师讲课，现在想来，可真是一种奢侈了。”

不过，金科也说道：“老师虽好，但作为学生的我们正值少不更事的年龄，又受到文革中造反有理，斗争哲学的种种毒害，同学间相互斗殴，甚至有学生公开打骂老师的事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校园里也是无法无天，混乱不堪。

后来，这种无法无天、混乱不堪的状况大为改观，应当归功于上面派来的校领导，一位刚从合肥市委‘解放’出来的老干部温桢一。”“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地‘拨乱改正’，使校园面貌和校风校纪发生了显著变化。”

温桢一治校严厉在校园里是很有名的。不仅大会小会，他要时常训话，反复强调严肃校风校纪。他还身体力行，爱管闲事。他时常早早地就站在学校大门口，专门抓上学迟到的学生。

那时校风之严，金科说了这样一件事：“迄今为止，我平生所写下的唯一一份检查，就是在合肥六中当学生时写下的。那是在读初中二年级时，讨论发展我入团之前，一位老师找我谈话。说我作为一排之长，带头追求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留分头，穿皮鞋，着小钢裤（一种当时上海产的裤腿较细的裤子），影响不好。想要入团，必须先写出书面检查，否则难以通过。”

温桢一对于自己的严厉，也说：“我治理学校，德智体发展，德育第一条。我自己带头做，作表率。比如看运动会，我要大家带凳子，这样砖头瓦片就没有了。下雨我就在那坐着，学生秩序也很好。有女学生摘冬青树叶，我教育她：‘头发拔一根没关系，可是拔多了就成了秃子了。’结果有人谣传我拔学生头发。”“我干记者出身，干什么都要自己看，不相信道听途说。有一次冬天跑步，我发现一个同学穿单裤，一个老师说他家庭困难，我就让总务主任买了棉裤，让班主任夜里偷偷送到他家（怕别人知道后都找到我要棉裤）。”“老师给学生写评语，写错别字，我善意地批评他。”

文革之中，似乎只能做做这样的小事。虽然这些看上去只是小事，然而一校

之长，天天、月月、年年，身体力行做这样的事，并且由此把学校管理的越来越好，不得不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时学校将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开门办学，不断组织学生去工厂、农村、部队参加所谓的三大革命。金科他们曾经学习解放军，进行长途野营拉练。无论师生，背着背包，不舍昼夜，风雨无阻，竟然绕着巢湖走了一圈。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集会游行、文体表演、忆苦思甜等等社会活动。去的最远的，是去南京参观学习，在澡堂里住了一夜。而大量参加这些活动，当时金科并没有觉得苦，更未意识到是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荒废，反而觉得十分有趣。真是把心都玩野了。

不过在合肥六中期间，他们也曾有过一段时间有学习压力。那是进入高中之后，邓小平复出，进行全面整顿，开始抓教育质量。合肥六中紧紧跟上，张榜公布学生考试成绩。这一做法立竿见影，一下使得他们紧张起来，也用功起来。不少同学脱颖而出，显露读书才华。

那时学校也开始恢复评选“三好学生”了，不再评选做毛主席的“五好战士”了。评选“五好战士”的重要标准是看学生走出课堂进行“三大革命”实践活动中的表现；评选三好学生的重要标准，则是考试成绩要在班上名列前茅。

然而，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也极为短暂，大概前前后后实行过一年左右吧。随着全国各大报纸突然鼓吹“白卷英雄”张铁生，宣传北京一位名叫黄帅的小学生的信和日记，而旋即夭折。全国教育战线都掀起了一股批判“智育第一”、“师道尊严”和“反回潮”、“反复辟”的浪潮。据金科回忆：六中也出现过由本届一些女生公开署名的大字报，批判学校这种复辟资本主义教育的考试制度。

这一时期，教师不敢教，学生不愿学，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在恢复高考后的前两年，当年考试成绩不错的同学，几乎全都考上了各类大学本科院校，约占金科那届高中毕业生的四分之一。而他所在的一班，竟然有一半的同学考上了大学本科。这个比例是相当惊人的。要知道，十年浩劫之后的1977年与1978年的高考中，本科生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二左右！而且他们那届同学还多是以农村知青的身份报考大学的。由此可见，当年六中在文革之中，重抓教学质量的功劳。现在想起来，金科也不禁感慨，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的幸运啊！

而今迈步从头跃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终于结束。1977年六中以良好的环境与校风，优秀的高考成绩和体育成绩，赢得了全市好评。这年冬，学校先后被评为市和省教育革命红旗单位。

1978年2月，学校根据上级规定撤销革命委员会和三大组，实行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责任制，恢复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名称。

6月，合肥六中被评为市重点中学。

7月，农药厂工宣队离校。

在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下，合肥六中终于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了。而自此，合肥六中的文革记忆也就告一段落了。

本文编者的话：

文革过去已经48载，我的母校不幸也有这么一段文革记忆。批判、武斗、揪斗教师、下迁、向阳、艰难办学，该有的，似乎我的母校也都有。可是，这真的是应该有的吗？如果没有这如地狱般的十年浩劫，我的母校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芬芳桃李呢？这一切，值得我们时刻铭记。

同时，我只是从校史中得到这么一点点相关资料，而这些故事，是我在上学期从未听说过的。仅仅四十八载，这些宝贵的历史却比那沉睡千年的秦皇汉武埋藏得更深，这是我必须严肃认真反思的。不仅仅反思文革中人们为何互相残杀，不仅仅反思文革中人们为何封建迷信，更要反思我们自己，是否还带有迷信的思想，是否已经忘记历史的教训。

立此存照，以昭后人。我们的前辈用自己的心血留住历史，而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又怎能把这些宝贵的资料丢在一旁。不仅仅是记录历史，更应该分析历史，评判历史，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述 往】

书声琅琅

——培元小学拾英

刘海鸥

一、开学 开学了

口试·1953年开始实行七岁入学的制度。我差几个月不到七岁，妈妈带着我不知跑了多少个小学，都不收。后来有人说私立培元小学可能收。

上培元小学是要经过面试的。面试那天，六年级的大姐姐（那时感觉她们真是高大）带我到阅览室等待。就是里院二层小楼楼下左手第二间。屋子里已经坐着一圈小朋友。我这个人不安分，坐在椅子上，翘起椅子的两个后腿，谁知那是折叠椅，这么一折腾，椅子自己恢复折叠状态。我趴在地上，椅子压在身上。大姐姐忍住笑把我扶起来。我一脸尴尬，心想，完了，学校一定不会收我了。

口试就在校长室，是王景英老师主持。她问道，你有几个兄弟姐妹，我说：“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犹豫了一会儿又加上一句，“还有一个二哥，但是不是妈妈生的。”那阵有个堂哥住在我家，我搞不清和他的关系，只知道喊他“二哥”。王老师问：“不是你妈妈生的，是谁生的？”我迷惑起来，仍坚持道：“反正不是我妈妈生的。”我妈妈趴在窗外隔着一层窗户纸听着，那个急呀。等我一出去，她说：“你根本不应该提那个二哥。”我想，这次彻底完了，我上不了小学了。

但是培元收了我！

文明启蒙·没上学之前，在家里野惯了，和院子里胡同里的小孩学了很多骂人的话。

开学第一天的中午，我在校园里转，看见班上两个文文雅雅的女孩在玩压板，我走上前去，让她们下来，我要玩。两个女孩不肯，我开口便骂：“（太难听了不能写）”。女孩说：“你骂人，我们告先生去。”就跑开了。我一个人坐在压

板上，心里忐忑着，怕先生来说我。

一会儿，其中那个满头卷毛，一只胳膊打着石膏吊在胸前的女孩跑来说：“你妈妈来看你了，我们向你妈妈告状了。”这比告诉老师好，我稍稍放了心。

因为是第一天开学，妈妈趁午休时间来看看我是否一切都好。妈妈问：“小朋友说你骂人了，骂什么了？”我避重就轻地支吾道：“‘他妈的’。”六岁半，已经知道什么骂人话最难听，什么次之。妈妈相信了，说了我几句。

我发誓，小学六年就骂过这一次人。包围在那么多文雅漂亮的孩子中间，又受到文明的启蒙教育，我再也不说脏话了。

那两个女孩是冯月辉（卷毛的）和孙孟里。

二、上学 我们上学

学习的事情记得不清了，杂七杂八的事倒记得不少。

撒饭节·大多数孩子自己带午饭。早上一到校，先把饭盒放到厨房一个巨大的笼屉上。中午一下课，孩子们一窝蜂涌去取饭盒。厨房里蒸汽腾腾，散发着百家饭菜混合成的特殊气味。董大爷或李大爷分发饭盒，孩子们围着像小麻雀一样吱吱喳喳。烫，小手拿不住，饭盒打翻在地。一片起哄欢呼：“撒饭节！撒饭节！”撒了饭的人因祸得福，班上的同学你给一口饭我给一勺菜，吃得比自家带的还好。

我非常盼望自己能过一次撒饭节，吃一次百家饭，但始终没有机会。

三轮包车·三轮车是五十年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学校里坐三轮车回家的孩子很多，一放学冲出校门，校门口一溜三轮包车已经守在那里。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我住在景山后街碾儿胡同，坐包车回家。有几个住在景山一带的同学也坐包车。同路的车夫们不紧不慢地并排骑着车，聊着光景，车上的孩子互相大声喊话说笑。

如果某一个同学的车夫拉散座没能及时赶到学校，他就搭另一个同学的车回家，挤在一个车上特别高兴。车夫一定把孩子们送到各人的家，不取额外车费。言炎住在景山东街的一个胡同里，我坐过言炎的车回家，妈妈问你做谁的车回来的呀？言炎，她会唱戏。妈妈说，是不是言菊朋家的孩子呀？坐过麦继平的车回家，妈妈问，你今天怎么回来的呀？我说，坐麦继平的车。妈妈说，姓麦，他一

定是广东人。

皇家厕所·小学的厕所令人难忘。木板的座位，木板上挖出一个不大的葫芦状的洞口，下面是大缸。孩子们如厕匆匆忙忙，“葫芦”的边上总是一片尿湿，坐在上面真不舒服。

本来以为培元小学这样的厕所是中国绝无仅有的创造了。六十年后在欧洲哪个国家参观一个皇宫，发现皇家的厕所，竟和我们小学的一样！

救世军·不管在教室还是校园，只要一偏头，北边救世军大楼面南墙上的大字就会跳入眼帘。白底黑字（现在想起来好像是颜体的），整条街都可以看到：“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长大后才知此话取自《圣经》约翰福音三章16节）

同学们人人都是可以背得滚瓜烂熟。课间休息时，大家像起哄一样大声齐诵这句话，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问妈妈什么是“救世军”，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妈妈说得清楚明了：“除了解放军和志愿军，其他军队都是坏蛋。”这个回答引起我的一丝不安，生活已是很安定的了，可是还有坏蛋的军队，挨着我们那么近。

姐姐班上有个叫齐济慈的同学家住在救世军里，我和姐姐去过她家。里面并未见什么军队。过道里黑洞洞的，挤着炉子，晾着尿片，有小孩在跑。齐济慈的家里又黑又破，就是寻常穷人家。救世军并不是那么神秘嘛。

红领巾·三年级开始“建队”。同学们一批一批加入了少先队。入队的程序极简单：班主任说了算。可我总是不被老师批准。我特别羡慕别人胸前的红领巾，在家带着姐姐的红领巾上街。我也知道入队是一件关乎“政治生命”的大事，我早就会唱那支让我们无比骄傲的歌曲：“红领巾胸前飘，少年儿童志气高。时刻准备着，为国立功劳。”但是没有红领巾，唱起来很心虚。

终于我加入了少先队。少先队大队长冯月辉告诉我，我之所以最后被接纳是因为会画画，少先队的黑板报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美术字的人。我加入了板报组，从那以后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与黑板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板报组·板报组定期宣传政治时事。一九五六年底左右，英法的轰炸机侵犯苏伊士运河上空。我在黑板报上怎么也画不好飞机，就找男孩子王以公来画。王以公几下子就画好了，一架飞机上载一个大鼻子飞行员，往下面投炸弹。下面是苏伊士运河。画得活龙活现。一个代课老师来上课，看了一会儿黑板报，说：“这幅画画得很好，但有一个问题，你们谁看得出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都没说到点子上。老师说：“炸弹扔到了飞机的前头，你们想可能吗？”大家把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

代课老师好像是叫白蕙。我们都很喜欢她，她态度和蔼，十分民主，课也讲得吸引人，五六年级时她讲的历史课有声有色，从那时起我十分喜爱历史。

大队日·学校定期过大队日，全校师生（一共七八个班）围坐在大院。先是举行仪式。旗手和护旗手在鼓队的伴随下绕场一周。然后是唱队歌行队礼报告人数，最后就是我们盼望的文艺演出，各个班级表演节目。我们都喜欢这样的大队日，特别是大姐姐们的歌舞。

要是早十几年我还记得是哪个年级演什么节目，甚至谁演什么。现在大脑退化，说不上来了，可是表演仍历历在目。

歌舞“五个女儿五朵花”——“集体农庄有一位老妈妈，她的名字就叫瓦尔瓦拉，生了五个亲生女儿五朵花……老大叫夏莎，还有叫娜塔莎、奥林卡、波铃卡、阿辽路奇卡，最可爱的小女儿年纪还只有十七八……”

五个女儿轮流表演自己的工作。忘不了那个当飞行员的女儿站出来，一个立正敬礼，上身转动巡视全场，真叫帅。

小合唱“在果园里”——“老伯伯请我们来到果园，穿过了密密的山楂树，苹果呀梨子呀落到地面，红光光黄橙橙又香又甜……”好像是说一个小朋友犯了错误……——私自拣了一个果子。原来歌曲不是光写好事，犯错误也能写到歌里。

舞蹈“我们生长在天山上”——“我们生长在天山上，快乐又欢畅，……”下面的歌词我记得很含糊：“轻轻地飞呀，慢慢地唱呀，快乐得像鸟儿一样。”为什么是“轻轻地飞”呢，小时候很多歌词都听错了。

诗剧《渔夫和金鱼》——后来我们也变成大姐姐了，成为表演的主力。上四年级时我们班的《渔夫和金鱼》应该是那次大队日的亮点。



我演渔夫的凶恶老婆子。我光顾演好自己的角色，忘了其他还有谁参演。据冯月辉回忆，麦继平演老渔夫，高忆陵演小金鱼，可她偏偏把我这个重要角色

拉下了。

怎么能忘呢，我系着妈妈的围巾，穿着爸爸的西装背心，还有妈妈的裙子，拖到地面，尖声尖气地演绎着老太婆的贪得无厌。

从那时起，我喜爱上了演戏。

据徐菜回忆，我们还在全校演了《大灰狼》。我竟然全忘了。

小合唱“我们的祖国又大又美丽”——是我们班里少年宫合唱团的成员唱的。绝对有冯月辉、朱铭，还有谁呢，我记不住了。

“我们的祖国又大又美丽，等我们长大后好好建设你，我要驾起钢铁的拖拉机，去耕种祖国无边的土地……”

那歌声真是美妙，特别是唱到二部轮唱时“让果儿长满山，让花儿开满地……”真是天籁之声！

我真是太羡慕了，羡慕到嫉妒，我多想也和他们一起唱，可惜没有那美妙的歌喉。哈哈，几十年后，我终于参加了合唱团，尽管老嗓子已经发紧，但还是在悉尼歌剧院演出了！

诗朗诵《中南海的灯光》——这是于老师派下来的任务。她拿了一份报纸给我，让我组织一些人朗诵这首诗。我记得，我，我们，朗诵时真是充满了感情：“明月闪着银光，北京进入了梦乡，中南海一片宁静，一个窗口还亮着灯光……”

啊呀，自己感动得不行。

抓美蒋特务·一九五五年，一场“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报纸上经常报道破获潜伏已久、伺机变天的，或台湾空投潜入大陆的美蒋特务集团的消息。电影《寂静的山林》、《徐秋影案件》、《国庆十点钟》等不断地给人们敲响警钟。我们订阅的《中国少年报》和《新少年报》上常常有抓特务一类的事情。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是说有一个潜伏特务男扮女装混入国家机关，因为永远穿着高领旗袍遮住大喉结而且能够一手提着四个装满水的暖水瓶引起人们的怀疑，从而揭发了他的真实身份。还有南方某农村少年儿童发现家中来的亲戚可疑，比如双脚白皙，手臂上有带过手表的白印迹，就大义灭亲，报告了公安局，果然是个空投特务。等等。在我的心中或所有儿童的心中，周围的人都值得怀疑，都需要考察。

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人人都想抓住一两个美蒋特务反革命分子，成为英雄。每天放学我都要按照少年报上所报道的小英雄发现特务的方法，在街上寻找蛛丝马迹。有一天我和高忆陵在墙上突然发现一个粉笔画的箭头，指着地下，旁边还写了几个数字，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可能是特务秘密接头的暗号，或者示意这下面埋着定时炸弹。我推断，反革命分子必然还有其他的活动和暗号。我把箭头和数字抄在纸上标明地址，继续往前搜索，果然在墙上地上电线杆上总可以看见一些叉叉道道圈圈，我激动得气都喘不上来，一路寻找下去。高忆陵没我那么强烈的英雄主义，走了一会就回家了。我不知走了多远，天已经全黑了，什么也看不清了才罢休。

下一个壮举是到派出所报案。我严肃郑重地把画满奇怪符号的纸片交给警察叔叔。警察没有我想象地那般紧张和重视。一个警察看看纸上画的东西，宽容地笑了，他说，这也可能是电线工人或管道工人作的记号。见我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他赶紧说，小同学，我们非常感谢你的革命热情，希望你继续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消灭一切反革命分子。我们会调查这些符号的，天黑了，快回家吧。

因为晚回家遭到妈妈的严厉训斥，但我没有告诉她我干什么去了。我觉得我正在干一件神圣并神秘的事情。我盼望着有一天公安机关根据这些线索破获重大反革命集团，报纸上登载了我的事迹，我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表扬，老师们全改变

了对我这个淘气包的看法。但是此事后来杳无音讯，那一天一直也没有出现。

“三件小事情”·报纸上说，毛主席号召全国少年儿童要做到三件事：除四害，讲卫生，绿化祖国。立刻就有郭沫若写了一首歌词给孩子们唱。“星星火炬”节目中天天教唱：

“除四害讲卫生，绿化要做到，学会普通话，三件小事情，样样都做到，小事做到了，大事就牢靠。”

歌词如白开水，曲子没腔没调，我和高忆陵私下议论说：“这么大的诗人怎么写了这么个东西！谱曲也难谱出调调。”相比之下，当时也确有几首旋律优美活泼的歌曲至今不忘：

“葵花黄，葵花香，葵花朵朵向太阳，排队排来行对行，站在青青的山岗上……”

还有：

“荒山野岭种植松衫果树，河边路旁栽下垂柳白杨，给山野挂上红色的帘子，绿色的幔帐，……。”

歌声的伴随下，我们步行到东直门外，在城墙边、荒地、还有自家的院子里都种上了蓖麻。蓖麻既可绿化祖国，其籽榨油又可以制成飞机上机械使用的油类。到了秋天，我们成群结队到郊外去收集蓖麻种子，一口袋一口袋，交到学校。

六亿人民六亿诗·随着“大跃进”，大批的农民诗人、农民画家和大批的民歌、民画涌现出来。每个人都要求为大跃进写诗，鼓而歌之。小学生也不例外，作文课写诗。这种诗好写，我一连气写了七八首，歌颂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大丰收、人民公社食堂、总路线：

“太阳一出红满天，英雄好汉万万千。移山造海逞英豪，一手推翻两座山。干劲冲破九重天，建设我国好江山。”

这是什么诗呀，就是顺口溜，而且大而无当，空洞无物。顺口溜流顺了嘴，古诗也遭了殃。课本上有一首张俞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我把它变成：“昨日上午去，归来泪满襟，门门五分者，不是赶鸭人。”把《悯农》改成：“上课日当午，腹中响如鼓，冲出校门去，

买块烤白薯。”总之，课本上所有的古诗都变成了浅薄的顺口溜。一时间班上流传我的歪诗，我得意得很（这些歪诗我早就不记得了，五十年后小学同学聚会，高忆陵竟然还背得朗朗上口）。终于有一天，我被叫到了办公室，于老师拿着一张纸，上面记录着我的“杰作”，问，“这些诗都是你写的吗？”“是。”“是你亲自写的吗？”“是我自己写的。”老师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有没有人指使你写这些诗？”我知道不好了，吭哧道：“没有。”“没有就好，要知道现在反革命分子，就是通过像你这样调皮捣蛋的孩子，散布这样的反动诗歌，达到污蔑共产党，破坏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我打了一个冷战，反革命没抓到，却和我这样联系在一起了。原来反革命是这么容易当的。

一件好事·要考中学了，于老师给我们出了大量的题目练习。我们已经模拟考试了好几次，我一点问题也没有。

模拟考试的作文题目是“一件好事”。我手头正好有一个现成的题材。五年级暑假的一个晚上，我和高忆陵表演完木偶从少年宫回家。走到沙滩，见无轨电车站有一个盲人坐在地上在叨唠什么。我们上前去问，盲人说，他家在十里堡。政府给他们安排了工厂的工作，在六铺坑。他今天去报到，谁知去早了，工作还没开始，只好回家，但是又没有带返程的钱。一天没吃东西了，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怎么回家。我拿出家里给我带的芝麻酱烙饼（因为演出没有时间吃）给他，又给了他两毛钱把他送上去十里堡的汽车。他一个劲地道谢，说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那是一个鼓励人们当英雄的时代。英雄的品格是从小炼成的，要从小事一点一滴地做起。我们都不放过做任何对社会有益或对他人的好事情。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了，我非常为此骄傲。

升中学的统考作文题目恰恰是《一件好事》（于老师扣题真准）。我把这事又写了一遍，手到擒来。我得了满分。

三、老师 老师教我们，我们听老师的话

王景英老师·一二年级时，班主任老师是王景英，大约二十多岁，大眼睛，圆圆脸。我们叫她王先生，学校改成公立后，才改称老师。

王老师不会跟我们生气和大喊大叫，即使生气，也是装出来的，眼睛总是慈爱的。我非常喜欢她，可以说在我的全部学习生涯中我只喜欢过这一个老师。我在班上是非常淘气的孩子，上课坐不住，左顾右盼，说话玩东西，削铅笔。顺便说一句，我削铅笔是一绝，铅笔头长长的尖尖的，匀称好看，下了课同学们排着队叫我削铅笔。连最优秀的学生冯月辉也叫我给她削，这让我感到很荣耀。

我上课还爱吃东西，每天带去的饭后水果我总是等不到中午，甚至连下课也等不到，上着课就低头在课桌下吃起来。小学生非常兴“告状”，发生了小摩擦，认为自己吃亏的同学就会像念经一样唱道：“我给一位同学告诉先生，她的名字就叫XXX！”每堂课开始，无数小手举起来：“王先生，XX拿我橡皮不还。”“王先生，XX撕作业本。”老师要用十来分钟的时间解决这些纠纷，“惩恶扬善”，件件缕清，如县官断案，比听课好玩得多。上着半截课也常有学生告状，有人就把我检举了：“王先生，刘海鸥吃香蕉。”王老师说：“把香蕉拿过来。”我只好把吃了半截的香蕉递到讲台上，只见她一挥手香蕉就进了垃圾桶，而我面对垃圾桶罚站到下课，闻着桶里散发的香蕉味，心中无限惋惜。

上课我不是乱动就是玩一切可以到手的東西，我的文具玩具常常被老师没收。没关系，一下课我就去找老师要。王老师总是又爱又恨地说我几句，再把东西还给我。有时她也会惩罚我一下，比如我拿了爸爸的多用小刀被她没收，她还不还，让家长来取。第二天早上妈妈上班前来到学校，我以为王老师要向妈妈历数我在学校的劣迹。谁知老师满面笑容地客气地对妈妈说话，还摸摸我的头拍拍我的肩膀，甚至还夸我几句。

我简直喜欢透了王老师。王老师也喜欢我，因为不管我多么淘气，不用功不听讲不做作业（全是由同院的大姐姐替我做，我的字四扯八拉，同院姐姐的字细小清秀，王老师早就觉察出来了，问过我“这是你自己写的吗？”我说：“是。”样子十分做贼心虚），考试却总是九十多分，王老师也懒得管那么多了。一年级期末竟然给了我一枚优秀生奖章，红色的，别在胸前，和那些好学生们一样，心中不知道有多么骄傲。

对了，我曾在街上碰见过王老师和她先生散步，似乎是学校唯一有丈夫的老师（二年级以前），这让我更觉得她多了许多温情。

毕业后我曾去看过她几次。文革以后就彻底没有了联系。二〇〇二年我在中

国探亲。一天晚上冯月辉来电话说：“快打开电视！”电视上正在介绍台湾著名歌曲词家庄奴的生涯，而庄奴竟是王景英老师的亲哥哥。在电视中有他们兄妹分别多年后在北京相逢的故事，他俩牵手在王府井、八面槽一带他们幼时最熟悉，也是我幼时最熟悉的地方散步。

冯月辉给了我王老师的电话，又跟她联系上了！王老师已经八十多岁，可是声音还和以前一样没有变，而且还清清楚楚的记得我。一听见她的声音，马上就让我想起了小学一二年级的生活。

二〇〇八年回国，听同学说王老师过世了。

黄孝伦老师·三四年级黄孝伦老师是班主任。一九五七年，老师整风。我们不懂什么叫整风。只知道每天下午不上课了。整风的老师们还很负责任，怕耽误了教学质量，留了好多功课。不光是学校整，全国都在整。结果是整出来了五十多万右派。我们都不知道学校整风的结果，——黄老师成了右派。

一九五八年我们上五年级，告别了黄老师，她又接任我妹妹的班主任。妹妹说，有一天上课黄老师眼睛通红，一进门就激动地说：“同学们，向秀丽同志牺牲了！”然后当着全班大哭起来。这样一个性情中人，怎么会是“右派”呢？

后来才知道越是率性者，越容易成为右派。

几年后黄老师因为癌症郁郁离世。怕是没有人给她平反了。

于俊麒老师·我们五六年级的班主任。这位老师专教五六年级，“把关”可有经验了。她的主要经验就是大量做习题和“维稳”。五年级一开始，每天一早，黑板上已经写满了数学题。同学们一到校，放下书包就做习题。于老师把抄黑板的任务交给了我，每天放学给我一纸习题。我回家做好了这些题，第二天一早六点多一点就到校喊醒董大爷开校门。抄好了黑板，我就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帮助同学解答问题。于老师只判我一个人的早自习作业，其他同学的让我来判。我这份光荣啊。（说于老师呢，怎么夸起自己来啦？）

这么大量的练习，大家演算基础可扎实了。

所谓“维稳”就是维持一个一切为中考让路的稳定的学习环境。“维稳”的努力曾让我们和于老师发生了很大冲突。六年级我们一些人热衷于排话剧，成立

戏剧组。于老师不允，说耽误学习。我不理解她的苦心，竟当面顶撞起来。后来双方都做了些让步，可以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排练和演出话剧。有一次于老师还给我们戏剧组一份报纸，让我们朗诵上面的长诗，这真让我们感谢不尽。其实于老师不用那么担心，我们除了学习，还有使不完的精力。不是吗？毕业考试我们全都为于老师和学校争了光。也不看看是什么学校，培元呀！

李德荣·我们的李校长，戴眼镜驼背，是学校五个男人之一。他说话声音不高，有点吭吭哧哧。早上全校集合若有校长讲话，下面准是一片嗡嗡。唯一记得他的一次讲话是私立学校转成公立时。他苦着脸，嗡嗡唧唧说了一些应该感谢共产党关怀的话，大家不需要交十五元学费，只交两块五就行了。那时正是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闹得凶的时候，学校虽非企业，也由私变公，改名为王府大街小学，实行了就近入学的原则，学校开始面向工农兵平民阶层。

姜老师·姜老师最为慈祥，没见过她大声呵斥过学生，总是和善地笑着。李校长走后她当过一阵我们的校长，又被调离到别的小学校。八十年代，有一天我在我家的胡同里碰见了她，原来她搬到了这条胡同。我和妈妈马上去拜访她。她已经退休，与外甥女住在一个大杂院的南屋，只有一间屋子，又黑暗又狭小，家具也破旧不堪。唉，一个有名的校长怎么会过着这样的生活呢？

周老师·管学校的杂务事，会计出纳采买刻钢板印考卷等等。我印象中，他总是勤勤恳恳、忙忙碌碌。现在我还保留着几张考卷，上面是周老师的字体。周老师的女儿周德娟是我们班的同学。

武玉真老师·武老师是学校里最负“厉害”盛名的老师。我见到她能溜则溜，溜不掉就老老实实站住行礼问候，而她总要评论一两句：“刘海鸥，去照照镜子看看，你的衣服有多勒特（邋遢）。”通往大院的过道有一面整容镜，我只好去站在镜子前面看里面那个勒特小孩。要不就是：“刘海鸥，你跑什么，走没走相，站没站相。”三年级时我开始看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还是章回小说，虽然有许多字不认识，但连蒙带猜，隔三跳五，还是看得懂。一天我手捧此书边走

边读看得入迷，没注意武老师走过，她叫住我：“刘海鸥，看什么哪，这么入神？”我把书皮翻给她看，心想也许她会称赞我两句。她一脸不屑：“你能看懂吗？捧着书做样子吧？”我该说是还是不是呢？

武玉真老师是我姐姐海燕的班主任，不知怎么的，和我姐姐那么对脾气，特别喜欢她，还让她当了中队长，姐姐也特别崇拜武老师。武老师厉害是厉害，但只要是她带的班，准是最好的，集体主义向心力特别强。

张艳贞老师·张老师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一到音乐课我们就到大院西北角的音乐教室上课。音乐课没有课本，老师发过好多歌曲的片子，是钢板刻印的。其中一张我记得最清楚，有莫扎特的“渴望春天”：“快来吧，亲爱的五月，给树林穿上绿，让我们在小河边，看紫罗兰开放……”我最喜欢这首歌，曲调美妙，老师的歌喉也美妙。可我那时并不喜欢张老师，觉得她特别厉害，没有笑脸。淘气的男生被她揪着耳朵站起来，据说疼极了。

小学毕业很久了，有一天在街上看见张老师，正不知是否要躲开，她迎上来，又惊又喜，问长问短：“刘海鸥，长这么高啦！在哪个学校读书呀？”满脸笑容，和蔼可亲，原来张老师是这样的！

后来我当了老师才体会，老师和学生没仇，老师心里喜欢所有的孩子。

老王老师·大家私下里叫他王老头。他是唯一一个教课的男老师，教图画大字珠算三门课。他岁数很大了，老眼昏花，说着一口不大容易听懂的话。他的课上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好学生在他的课上也无法自律了。无论多乱他根本不管，照讲自己的。

三年级的图画课，他让我们画写生，我画了一个大萝卜，他给我打了五分。我真高兴，头一次知道，自己画画不错。

王老师判大字很认真，字写得整体好就画大红圈，哪个部位写得好，就在那个部位上画小红圈。我的大字本上大小红圈很多，所以上他的课我虽然折腾，但画画写字还是很认真的。

老董和老李·是传达室的工友。刚开始所有的孩子都直呼其老董老李，直到

学校改成公立后，校长要求大家尊重工友，尊敬老人，才改称董大爷李大爷。他们管开门、静校、打铃、清洁、生炉子和烧水之类的杂事，中午还要给上百个孩子热饭。

五年级时，我得到于老师分配给我的光荣任务，每天早上把早自习练习题抄在黑板上。六点半我就到了学校大门。大爷们还没起床，我站在传达室冲着校外的小窗口喊：“董大爷，董大爷！”半天他才披着衣服出来开门，嘟嘟囔囔道：“刘海鸥，又那么早！”

四、 再见了，培元小学！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毕业季升学考试揭晓，同学们到校查看分数和分配结果。

每个人都有一个留言本，互赠留言，都是：“祝你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一类豪言壮语。老师也给我们题字，记得最清楚的是邬丽天老师的漂亮字体，留在我本子上一段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尽管目睹了大人們的那么多政治运动，尽管在老师眼里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小学时期仍然是我最幸福的时代。那首歌唱出了我们的心情（也许是我们的心情被那首歌引导着）：“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好像那花儿在开放，跳呀跳呀跳呀，唱呀唱呀唱呀，亲爱的领袖毛主席（文革后这首歌又拿出来唱，歌词改成‘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和我们在一起过呀过着快乐的节日。”我觉得每一天都如节日般美丽，我看到的都是积极的一面，我相信祖国会变得越来越好，几乎每过一年我的心里都会说，今年比起去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国家又有很大的进步，想到这一点，心里涨得鼓鼓的，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期望。

告别了同学和老师，我们升入了中学。

再见了，培元小学！

【述 往】

日记告诉我们

(1958年3月——1959年7月)

刘海鸥

这里是我小学时期日记摘抄，只抄了与小学生的生活有关的部分。文字上除了改掉一些太让人丢脸的丢字、漏字和错别字，如“的地得”的混乱使用外，没做任何改动，即使句子不通也就那样了，原汁原味嘛。

这些日记希望再勾起同学们的某些回忆。

(没有日记的时间)

今天是开学。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到了学校。同学都相见了，老朋友似的亲密地谈着。不一会儿就上课了。于老师刚走进来，同学们就都站起来喊着：“于老师好！”于老师微笑地点着头，让大家坐下。

说了一会儿别的于老师就说：“因为整风学习刚结束，老师们没来得及备课，所以延迟到十四号开学。”我听了很扫兴，因为我老早就盼望着开学，谁知又得延长。接着于老师又说：“十二号早上八点到学校大扫除，到十二点回家吃饭，下午一点再到校。第二天早上还来。等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就到派出所去报捷。”她还说：“十二号下午发书，十四号开学。如果现在带了学费的就教，没带的就下午两点交。有的同学一时交不上来就开学后再说。不交的可以回家。”我打算开学再交，就不在学校多留，回家去了。

1958年3月12日

今天我一早就爬起来了。你们一定记得今天还要——大扫除。三刻钟之后我已经到了学校。不久开学典礼开始。校长讲了话，并说可以各班向各班挑战。回班以后于老师说了些别的后就说：“咱们向哪班挑战？”“六年级。”“一年级。”……同学们纷纷地议论起来。“最好向附近的班挑战。”于老师说。“向三年级二班挑战。”不知谁说，大家都同意，于是就选我写挑战书。是这样写的：

“挑战书

向三年级二班挑战，做到六面光。保证教室里外清洁。”

挑战书送去不一会儿也送来了应战书。结果是谁干净我也不知道！

1958年3月25日

今天我们小队卖报。昨天是海燕卖报。她说她在孙家坑胡同里挨门挨户地问。于是我也学习。我们先到报房胡同。出了报房一份也没卖出去。刚开头我们都不怎么敢喊。后来我们也敢大声喊了，可就没人买。汪周南对一个三轮车夫说：“买份报瞧瞧吧，我们是支援红领巾拖拉机站的。”那个三轮车夫说：“可惜我没钱。”

快到五点半了我们才卖出了五份。我、汪周南、金铃铃共有15份，现在才卖了三分之一。我们定好六点以前把钱送回学校。怎么办呢？还有七份（我们一人买了一张），到哪卖呢？我说：“到我们胡同卖去。一则我们家买一张，二则我把书包放回家。”于是我们一边喊着“北京晚报”，走进了胡同。一些调皮使人讨厌的孩子说：“就是北京早报我也不买呀。”到了家拿着报刚要走，阿姨叫住我对我说：“海鸥你到饭馆里卖，准有人买。”我一听这是一个好办法，就准备试一试。

到了“灶温”饭馆，我们大喊了一声：“北京晚报，谁要北京晚报？”没人答应，我们失望地要往外走，热心的服务员叫住了我们。要我们问一问，态度要好，不要进去一嚷，想买的人也不买。于是照着他的话挨个地问：“你买不买北京晚报？”果然有四个人就买了。接着我们到“白魁”卖了两张，就走进一个花房，问他要不要北京晚报，他本来不想买，但又不好意思拒绝，就买了。一切都很顺利。最后只剩两份了，我说：“这两份你们要吧？”汪周南说：“咱们应该尽力卖出去，卖不出去再买。”两份报很快就卖完了。我们把钱交给学校。明天我们还要把窍门推广全班。

1958年3月30日

今天我们下午到建国门外护城河旁边去种蓖麻。下午我们到校一会儿，第一中队的队员们就出发走了。一路上我们已经是累了，可是一到那立刻就忘了累。我们是第二小队。第一、二、三队划分了一个种蓖麻的地区。。六年级和我班四、五、六小队也都划分了地区。我们是由黄老师带领的。开始是挖坑。我和

冯月辉借了把镐子，把我自己的铲子借给别人。于是谁有啥事都来找我：“刘海鸥，你来帮我把这块石头掘出来。”“刘海鸥，你瞅我这有个石头刨不出来，你帮帮忙。”“刘海鸥，我这块地太硬啦，你给刨刨。”我忙得跑来跑去。大约两个钟头后我们愉快地结束了种植活动。说实在的，我已很累了。

1958年4月8日

今天我到学校想起我还没复述，我就自动到老师那去。等了好一会儿才轮到我。我开始复述，于老师微笑地听着。一会儿复述完了，于老师说我这次复述有很大的进步，用虚词很多，给我得“5+”，这个分数是最高的啊。上学期徐蔚东复述就得了“5+”。这回我也得了，几乎难以自信了。我刚出来大家就嚷起来了：“刘海鸥复述得了5+！”。我走进教室，大家就围住我了，有的说：“真棒。”有的说：“你还是这学期第一个得5+的呢！”

我一定要把这个喜讯告诉妈妈。

1958年4月18日

好久没有写日记了，已经一个星期了。在这些天里都没什么可写的，但是现在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号召全市人民捕麻雀，现在我们掌握了麻雀的弱点，就是利用这些弱点来对付麻雀的：

轰！让麻雀无处落脚，饿死累死！

打！让麻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毒！让麻雀断子绝孙！

掏！销掉‘老家贼’的“户口”！

中午我们讨论从19日苦战三天（放假）轰麻雀的时间。讨论的结果是19日下午2点——7点30分。20日是由早晨4点半到10点。21日和20日一样。

下午我们过队日，是到景山玩。因为时间不够，我就简单说点吧。下午到了那儿玩捉特务。我和刘定华当特务，在晚上杀了一位工程师，盗取了文件。公安人员王以公、周小力、徐小菊调查事件。他们很笨，始终不知道谁是特务，把其余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小队队员）都捉来了观察我们的神色，终于我和刘定华被看出来。

1958年4月19日

今天一大早海燕和克阳就走了，那时才4点多一点。她们才走我就听见扩音器里喊：“街坊们该起床啦！”接着就是一片“乒乒乓乓”的响声。

我家来了几位少先队员，他们也“乒乒乓乓”地用东西敲。我实在睡不着了，也起来和她们一块敲。不久妈妈爸爸元元都起来了，全院、整胡同都响了起来。现在到处都有敲东西，吆喝声。下午我到椿树胡同去轰麻雀。大家带了小鼓、小锣、镲、竹竿等东西，合起来成了一支乐队了。到晚上我们才回家。

可是今天我还发现这样一件事：我爬上房要轰麻雀，看见有两位学生也在房上轰。忽然我发现在一位同学的竹竿上扎着领巾。报上明明登过一律不许用领巾、国旗、奖旗来轰赶麻雀。于是我就大胆的走上前去质问，可她还强词夺理地辩护，什么“废物利用”呀，“不是我的”呀。最后她说不过我，从另一个房顶下溜走。她走后，我还发现屋顶上被她们踩踏了一个洞。这使我很气愤。

1958年4月20、21日

这两天我每天早上四点都去椿树胡同。20号我们到元元托儿所去帮阿姨轰麻雀。后来又到一个家人那去，那家人只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和一个妇女在家照看孩子。我就帮他们轰。21日我借了一支弹弓来轰麻雀，轰了不少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成绩可不小呢！共捉了40多万只。

1958年4月25日

今天是体育节，是我们学校的传统习惯，年年都要举办。下午开大队会，也就是体育节。先是体操，然后是二年级的“播种比赛”……另外还有我们和六年级的“障碍物赛”。冯月辉他们那些大队委都聚精会神地看着谁犯规了。

最后一个节目是我们班和六年级拔河。真倒霉，我们拿起绳子，王老师吹了一声哨（意思是叫旁边的同学静一静），我们班误会了用力地拔，这时六年级忙叫停止，我们刚停止，武老师又吹起了哨子，我们没料到，被拔过去了。

1958年4月26日

“五一”快到了。游行有我（不是游行，场内站队）。我是多高兴啊！花早在前天和昨天就做好了，明天就要练队。我真盼着“五一”快点来呀。

1958年4月30日

明天就“五一”了。今天游行的同学又召集在一块了。武老师给我们讲了好些事情，什么明天戴口罩、手绢、领巾和吃的，都要放在一块千万不要忘带哪样。这回比上回讲得清楚点。后来又分组才回家。我是多么盼望明天不要下雨啊！

1958年5月1日

今天是“五一”一早我就到了学校。人到齐了我们就往灯市口小学出发。接着东四区的四个学校：王府大街小学、灯市口小学、史家胡同小学、多福巷小学一齐开往天安门。到了那我们坐下来，一面吃东西，一面焦急看着西南面大楼上的大钟。好容易盼到了十点钟，惊天动地的炮声响起来了，庄严的国歌也在奏着。我们挺直地站着，严肃地站着。等国歌和国际歌都奏完，我们立刻喊起“毛主席万岁”来。游行的人们不断地走过去，我看见他们举的牌子上写的除了“毛主席万岁”外，还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和“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后来涌向主席台时我跌了一跤，差点被踩着。

1958年5月4日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下午我们中队和六年级的中队去看我们的蓖麻。到那蓖麻已经有一两寸高了，尽是三个两个的长在一堆，我们移了几棵。还有一个坑十七八棵的呢。于老师说等到下雨时再来一次，把蓖麻移移，那时土会松软些。

1958年8月5日

上个月学习考试我的功课很紧张，一直没空写日记，现在放暑假了，本想好好玩玩，谁知就等于没放，因为 1. 学校除去小队日，还有什么卫生监督岗和萤火晚会、联欢等等。2. 现在我们的木偶组在暑假里要排十二个节目，还要街头各地演出呢。3. 放假前，武老师介绍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参加少年宫的壁报训练班，每星期三活动。木偶组是每二、四、六活动，一整天还要带饭去。这差不多

等于天天都要事情，开学我非累趴下不可。

1958年11月22日

今天我到学校才想起我们小队的个人学习计划还没订。就叫他们订好交给我。谁知道了第四节念计划，原来是订小队计划。我说：“我们没有订。”于老师批评我们自由散漫，订个人计划就是单干。我也觉得我不对，因为我在开中队会时没听见，结果就闹成了这样，小队的队员也对我很不满意。于是我刻不容缓地下了第四节课做完值日就召开小队会，我们把个人计划归纳起来，然后扼要地提出几点。队会很快就开完了。这会进行得很顺利，没人不守纪律，也没人因为饿抱怨一声。我很过意不去，下回我再也不能那样了。

1958年11月24日

今天下午我到学校，张老师叫住我，交给我个任务，叫我把一年级课本里的一张插图放大在黑板上。我想我怎么能会呢？但再一想，还是尽力画好吧，就一口答应下来。下课后我、董淑珍、高忆陵在卫生室里画，不久就画好了。张老师说画得还不错。画完后我、高忆陵和赵德娟到关一文家去。她今天没来。到了她家，原来就是伤了风，没什么的。我们把功课告诉她就走了。现在我要温自然了，明天还要考试哩。

1958年11月25日

今天我们考自然，一切都很顺利，没有一题把我难住。

下午我们上两节完课就要在大街上宣传。宣传就是：1. 家长应带好孩子。2. 走便道。3. 走人行横道。4. 坐电、汽车要注意的事项。5. 骑车人所注意事项。6. 做好垃圾三分类。7. 保持街道清洁。8. 防止煤气中毒。

我们主要宣传第五条，天黑了，（骑车）人们都不点灯，我们就喊就追。有的认真狡猾，他们口头答应，就摸一下灯算完事；有的说，就到地方啦，推出十几步远又骑上车扬长而去；有的甚至不要脸皮，喊他他不听，闪电一样驶去；有的舍不得费电池，说他他就点一下，又灭了。回来时我的嗓子全喊哑了。

1958年12月4日

今天我们壁报组举行了一次时事测验。我们凭着平日早晨做的时事介绍出的题，题都不难，我们共出了六题。头一题是：____月____日朝鲜_____访华代表团到京。二题：1959年到1965年苏联要实行一个_____计划。三题：日本反动政府首相是_____。四题：____月____日保加利亚_____主席逝世。五题：____月____日，召开了第一次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六题：____月____日我国的第一艘_____巨轮下海。这么容易的题都不会，大概我太主观。我们的这次测验得1分的有5个人；得2分的就有25人；得3分的有9人；而得4分5分的才有6人。我把这次测验总结写出念给同学听，并说以后我们常要举行测验，叫同学提高警惕，注意听时事介绍。

1958年12月31日

今天是58年最末了的一天了。今天我们小队赶排了一个话剧“蓝领巾”，改名“红领巾”。准备今天晚上演出。

晚上新年晚会开始了。各个小队把自己的节目都献出来了。有的小队演话剧、木偶、唱歌、朗诵，都很精彩，大家愉快地笑着。但是于老师严厉地命令大家不许笑。本来嘛，新年大家应该是快乐的，但是大家变得闷闷不乐了。到后来还是于老师开恩，许我们玩闹，教室里立刻热闹起来，晚会在热闹声中结束了。

1959年2月27日

我们的“好和坏”（注：是纸壁报，当时办了两份——“好和坏”主要是在班上展开表扬和批评；“万紫千红”是讲形势。采取大家办报的方针，谁有想法可以写纸条贴在壁报上）上贴满了纸条，写的是关一文、赵德娟和好的事。还写刘继勋，他是大队委，上课带头闹，说他他不听，还摔门。同学（贴）的意见他不看，还说他们提的不对我干嘛接受，简直太骄傲了，同学们更气愤了写了更多的纸条，我们准备整理一下，就摘下来了。

1959年7月21日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我又有一学期没写日记了。今天是放假的第三天，我趁

中午的时候写写。这学期，我们是毕业班了。校长三番五次地给我们讲话，尽是关于升学问题的。大考（也就是毕业考）我的成绩还不错（据老师说），可是一天推一天老不发，现在放假了，还没发，说要等24号才发。据说这学期我们班一律都得“良”，也有得“优”的。我的好朋友冯月辉考音乐中学，情况怎么样现在还不知。大考前同学们都互相留言，我也请不少同学给我留了言，我也给别的同学写了。同学们写的大部分意思差不多，同学们都互相鼓励“到中学后要好好学习，早日跨进共青团的大门，做一个有用的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我把这些诺言牢牢地记住了。我讲讲这学期所发生的事吧。

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了叛变，后来叫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在短的时间内平息了。（下面长篇介绍“平叛”经过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诬蔑”。省略。）

4月27日，我、徐棻到冯月辉家去。我们大家谈着美好的将来，理想的志愿。大家都想，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吧，永不分离。大家不约而同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我们自然是很高兴啰。我们许下了诺言——齐心书：“我们三个好朋友，立志加入共青团，做党的好助手，学习刘胡兰、向秀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宣誓之后，我们庄严地交换了领巾。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实行诺言！

6月1日，我们三个合拍了一张相片。

在这一个学期中，在我们国家里出现了两位女英雄——向秀丽和徐学惠（下面是介绍她二人事迹。省略。）

6月19日我们曾去朝阳公社收过小麦。这回我真正地看见了小麦。我学会了捆麦和割麦，升入中学之后，我们要参加更多的体力劳动呢。

1959年7月24日

今天发分数通知书，我没去。徐棻来告诉我的。我考了199分，考上女十二中，初一十班。班主任李晓尘。徐棻也考上女十二中，初一九班。我们多希望分在一班呀。就汪周南和我一班。徐棻很羡慕我们的班主任。徐棻的姐姐徐植说我们的班主任是个老党员、红军，非常好。我多高兴呀！能有这样一个班主任。她是教政治的。

【资料】

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 还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本刊评论员

解放十七年来，教育领域里一直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焦点就是要把青年培养成什么样的接班人。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按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关心和重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早在一九三四年，毛主席就为苏区教育事业制定了总方针，指出：苏维埃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又为抗大规定了办学方向，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立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的。”

当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又亲手制定了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指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反革命修正主义逆流，列宁主义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发生全面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当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的时候，毛主席又英明地总结了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发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号召：“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

“树欲静而风不止”。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实现其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也从不放松以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培养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

一九三九年，正当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的时候，他抛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欺人之谈的“黑修养”，妄图把广大青年引入歧途。

一九五〇年，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他又急不可待地提出青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建设，想把广大青年引上只专不红的道路。

一九五六年，他又变本加厉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以资产阶级法权为诱饵，大肆鼓吹什么“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妄图把青年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都十分尖锐的一九六四年，他疯子似的东跑西颠，扯开嗓子，喋喋不休地叫嚷：“半工半读”可以培养“书记”、“厂长”、“中央委员”，大肆宣扬“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世界观。

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的斗争，就是这样惊心动魄、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

(一)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因此，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首要问题、根本问题。拥护还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培养青年，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

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因此刘少奇一伙一贯伙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一代。他胡说什么“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是’还是‘非’，要研究一番才知道。”“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外国的经验、世界革命的经验”说有人认为“中国的书还读不完，毛主席的书还读不完呢！或者至少先读中国的书，再读外国的书等等。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又大肆叫嚣“不要摘引毛主席的话当作课本上的话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学时不一定多”等等。

一九六〇年以后，广大青年热烈响应林副统帅“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伟大号召，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在革命化的大道上飞速前进。刘少奇眼看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美梦就要幻灭，于是赤膊上阵，挥舞起学习毛著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的大棒，反对毛泽东思想进课堂。

刘少奇一只黑手砍掉毛主席著作，一只黑手捧出反对参加革命斗争、鼓吹“孔孟”修身之道的反动的黑《修养》，在三个紧要的历史关头出版或再版这本黑书，大量推销，把它作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毒害广大青年。

但是，螳臂挡不住历史车轮的前进，魔鬼的黑手再大也遮不住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今天正是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拿起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狠批黑“修养”，直捣刘邓反革命老巢。也正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宣判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死刑。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用黑《修养》毒害青年，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美梦，彻底破产了！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教育必须把阶级斗争当作一门主课；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有牢固

阶级斗争观念的人，能认清政治形势的人，能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人，能判断是非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站稳立场，明辨方向，成为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伟大导师毛主席对青年一代的谆谆告诫。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长期以来，一贯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他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重复胡适之流“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的反动理论，鼓吹青年走只专不红的道路。早在一九五〇年他就对留苏学生说：“革命是抓得差不多了，敌人已被打倒，只剩下个资产阶级……可以教育改造。要你们去，不是要你们学习这个问题，你们学习的任务是建设”，是“掌握一门技术”。不讲革命，不讲阶级斗争，只讲建设，只讲一技之长，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刘少奇有时也冠冕堂皇地讲几句“全面发展”，但他认为的“全面发展”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发展”。按照他的“全面发展”培养出来的人就是“有文化知识，又有劳动本领”的人；就是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思想革命化，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人；就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刘少奇这一套，归根结底就是用阶级斗争熄灭论，解除青年的思想武装，要青年把国家大事，人民大事，阶级大事，党的大事，世界大事丢得一干二净，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抛到九霄云外，而成为十足的糊涂虫，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驯服工具”！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无产阶级的“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教育青年，培养青年，使青年成为像张思德同志那样的完全彻底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成为像白求恩同志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战士；成为像雷锋、王杰同志那样，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样的人，就能

把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就能保证社会主义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就能把中国和世界革命坚决进行到底，直到最后的胜利。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千方百计地用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青年、毒害青年。他竭力贩卖“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黑货，不遗余力地多次向青年宣传“你们不要怕吃亏，能吃亏的人对自己没有什么坏处。”这实际是“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的反动理论的翻版！他还大肆宣扬“今后搞什么都要专门知识、专门技术”，拼命鼓吹业务至上、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并且恬不知耻地以“领袖”自居，号召党团员“都要下苦功夫学习，认真钻研业务，很好地掌握各种专门技术和科学知识”，以便成为“红色专家”。他还处处以资产阶级升官发财的反动思想毒害青年。他多次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说：“我劝你们回乡后，认真种三五年地。到那时，一切农活都学会了，农民能做的事，你们都能做……你们有文化，农民没有，比农民多一条。再加一条群众关系好，就能当乡、县、省的干部，还可以到中央，那就看个人的本事了。”他甚至公开鼓励青年从事剥削，他对分配到塔里木工作的毕业生说：到了工作岗位，“可以盖房子，自己住不了，可以出租收房钱”！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这些谬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肮脏的灵魂和罪恶的目的。按照刘少奇的黑指示培养出来的人哪里还谈得上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生，哪里还谈得上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哪里还谈得上为人民的利益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不惜千百万人倾家荡产的吸血鬼，只能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只能是为追逐名利而不择手段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一句话，按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赫鲁晓夫的门徒，阿朱别依式的“精神贵族”！

(四)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在阶级斗争中产生，“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是没有生命力的。毛主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因此，阶级斗

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最好课堂。只有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培养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一贯和毛主席对抗，把书本和教条作为学习的唯一原则，鼓吹关门读书，引诱青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胡说什么“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研究。”刘少奇就是企图用埋头读书，钻研理论为诱饵，使学生在学校中进行舒舒服服的“和平演变”。

当革命学生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积极投入三大革命运动的时候，刘少奇便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大肆诬蔑这样做“降低了学习的质量”，并且叫嚷少学的功课“要补起来…”；这样还嫌不够，又下令：凡参加农村四清的学生“劳动一年可以不要了”，“当兵两个月可以不当了。”刘少奇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难道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吗？他要培养的，就是脱离革命实践，脱离火热的阶级斗争，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的人。这样的人不是毫无实践知识的草包、白痴，就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伟大导师毛主席对青年一代最大的鼓舞和最殷切的希望。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要完成世界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跟着伟大统帅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乘风破浪，奋勇前进，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让帝国主义妄图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梦想彻底破产！

让刘少奇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

中国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

世界的前途也是属于我们的！

——摘自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教学批判》编辑组 1967年第3期

【资料】

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据点 修正主义教育的实验田

——北京景山学校调查报告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教改组景山学校调查组

前 言

一九五八年，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中，出现了一个教育大革命的高潮。广大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向着腐朽反动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旧教育制度发动了猛烈的冲击，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以刘少奇、邓小平和陆定一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这场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地扑灭革命的火焰。他们恶毒污蔑教育大革命“搞糟了”，“劳动多了，政治运动多了，知识少了，科学文化丢了”，“教学质量降低了，连国民党时代都赶不上了”……全盘否定教育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一九六〇年初，他们召开了全国文教书记会议，大搞所谓“教学改革”的实验。黑阎王陆定一又在全国人代会上做了《教学必须改革》的讲话，抛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教改”纲领，胡说什么教学上的主要矛盾是“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的矛盾，用所谓“缩短年限”和“提高程度”代替了对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的彻底批判。他们在“教学改革”的旗号掩护下，全面恢复并变本加厉地推行一整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为了推行他们这一套反革命的“教学改革”，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由陆定一亲自指挥，童大林直接控制的北京景山学校就在这时产生了。

一. 阎王殿的实验田

景山学校是由原北京九十一中和东高房小学于一九六〇年三月合并组成的。这个学校是由旧中宣部直接领导的所谓“教学改革实验田”。建校以来，先后进行过“九年一贯制”，“十年一贯制”，“十一年一贯制”的实验。现在，学校里有小学、初中、高中，还有三个大学班（政治班、化学班、外籍班），共一千四百一十三名学生。

景山学校是旧中宣部以陆定一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推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要据点，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基地。这个学校建立后不到三个月，就被封为“先进单位”，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从此名扬全国，四面八方前来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旧中宣部从美、英、德、日、苏等国搜罗了不少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先进经验”，又从中国的古书堆和腐朽的“科举制度”中拣出一些封建主义的破烂货，统统移植在这块“实验田”里，又以此为基地，把这些黑货散布到全国各地。陆定一在给童大林的一封信中说：“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在我国有一个比较好的教育体制，这样，就安心了。”景山学校就担负了“创造”一个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相对抗的修正主义教育体制的任务。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直接插手景山学校的“实验”，他曾亲自听取童大林的汇报，并对童大林说：“你们学校办得不错嘛！”邓小平也曾直接给这个学校作“指示”。陆定一对这个学校更是非常重视，他派自己的亲信——旧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黑帮分子童大林直接负责抓这个学校；派他的笔杆子、旧中宣部干部方玄初（即敢峰）担任常务副校长（无正校长），还派旧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庞达和旧中宣部要员×××担任学校七人领导小组成员。派旧中宣部科学处的×××担任学校数理化教改“高级顾问”。这样，景山学校被紧紧地攥在刘邓黑司令部伸出来的黑手里，成为他们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特殊工具。

童大林到了景山学校后，首先着手安插亲信，招降纳叛，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做组织准备。他除了扶植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外，还到社会上请了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教授到课堂上放毒。如早在一九五四年就被批判过的反动学阀俞平伯，被鲁迅痛斥为“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中的封建余孽魏建功以及为蒋介石反动派效过“犬马之劳”的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王力等

等，全被他们誉为“圣人”“大师”，捧上讲台。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勾结在一起，统治了整个景山学校，卖力地推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为了把广大革命师生当作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驯服工具”，他们于一九六〇年搞了一次全校“整风”。他们搬出刘少奇的黑《修养》，大肆鼓吹奴隶主义，用修正主义的组织纪律威胁说：“对教改的态度就是对革命的态度，反对教改就是反革命。”还大喊要“纯洁党性”，要求干部教师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命是听，忠实地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要求同学们甘心情愿地当“教改的实验品”（牺牲品），任他们摆布，不得有半点反抗。

童大林还根据陆定一的黑指示：“教改的过程就是建党的过程”，在景山学校进行了“党的建制试验”。不仅在一九六二年把党委领导制改为校长领导、党委监督制，而且步赫鲁晓夫后尘，按照苏修“工业党”和“农业党”的作法，在景山学校党支部取消了宣委、组委等职务，改为语文支委，外语支委，数学支委等等。他们竟敢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党中央的所在地，搞了这样一个修正主义的“业务党”，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其猖狂！

在这个阎王殿阴影笼罩下的角落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疯狂地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童大林公然叫嚣：“我们要顶风而上，要敢于走自己的路，不管别人怎样说……”一句黑话，把他们的狼子野心暴露得清清楚楚！他们所以要办景山学校，就是要顶着毛泽东思想的东风，大干一场，把中国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长期以来，景山学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对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英勇的斗争。

二、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温床

为哪个阶级服务，培养什么人，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和资产阶级教育方针是根本对立的。

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猖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

教育方针，公然宣扬学校要培养“红色专家”，要建立“技术干部的队伍，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在景山学校，黑帮分子童大林按照刘少奇的腔调，狂妄地叫喊：“我们的毕业生决不能成为像雷锋那样头脑简单的人，如果都那样头脑简单，中国就要亡国了。”“景山学校要出天才，出专家！”“要培养一大批有名的大人物，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大工程师，大作家。”“要培养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国家干部的骨干，掌权的人”“培养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培养总理、中央委员、外交家、军事家……”“还要培养笔杆子，制造舆论的人”，甚至公然叫嚣：“培养不出马克思、恩格斯，培养出一个希特勒也好！”真是狗胆包天！

一句话，他们就是要培养一批抓枪杆子，拿笔杆子，掌印把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培养精神贵族和新的特权阶层，培养中国的柯西金，勃烈日涅夫和阿朱别依！

为了“多快好省”地培养出这样一批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才，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景山学校大肆反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挥舞大棒，解散毛著学习小组，大反毛主席语录进课堂。他们在一九六五年八月写的一份政治思想工作总结中，公开叫嚣：“我们一直不同意在学生中专门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杀气腾腾的命令“及时纠正某些教师从外校搬来的毛主席语录进课堂的简单化做法”和“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现象。”童大林还恶毒地说：“防止用毛泽东思想做高级精神棒棍”，说什么林彪同志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指示是“对工农兵说的，对知识分子要潜移默化，死学活用”，说什么“天天学的意思是经常学，真的天天学就是走过场……”。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妄想黑手遮天，不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照进景山学校。

为了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的运动，他们抬出孔子、孟子、诸葛亮、文天祥、岳飞以及托尔斯泰、哥白尼、达尔文等几十具僵尸，作为“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学习榜样”，准备在学校里放置他们的雕像，画像，语录，并开展纪念活动。

他们打着“智育第一，知识第一，分数第一，升学第一”的黑旗，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们鼓吹“越专越好，不能为了红而丢了专”，并提出大量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比如：

“智育是学校的基本任务”，“勤勉学习是共青团的战斗任务”，“天天消灭一个错别字，天天写一篇日记，天天背点书，天天写一篇大字。”……就是不提天天读毛主席的书，不提天天改造思想。

为了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少年，他们还经常大搞竞赛、评奖，大搞物质刺激，什么数学竞赛、百题赛、作文比赛、朗读比赛、背诵比赛等等。评奖的名堂很多，单是作文就有“红杏奖”、“青兰奖”、“百花奖”等。被他们取中的学生，“红榜挂名”，有的人得到大大小小十几个本子和成套的线装古书。童大林甚至学习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企图将助学金改为奖学金，来收买“高才生”。这些毒辣的手段，使不少青少年深受其害。

景山学校根本反对学生走出课堂去和工农相结合。有的同学作文中写自己将来要上山下乡，当个普通农民。童大林之流竟说这种理想是“下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童大林等人甚至公然对抗毛泽东思想，猖狂叫嚣：“中小学生没有必要向工农学习，没有必要与三大运动相结合。”

有时，他们也谈“劳动”和“劳动化”，但完全是刘少奇、陆定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货，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根本不是一回事。陆定一抛出过一篇《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毒草，抹煞阶级斗争，空谈所谓“劳动”，用“适当增加劳动”代替教育制度的根本改革，用“既是劳动者又是知识分子的新人”代替“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童大林秉承陆定一鼻息，胡说什么“劳动要做广义的理解，这里包括‘家务劳动’，如浇花、扫地、喂鸡抱孩子等。”于是，他们抛出一个“每天干点活的口号”，以游戏式的“家务劳动”取代了和工农结合、劳动化、革命化的方向。

景山学校还按照刘少奇的黑讲话，对学生进行所谓“劳动化”的教育。刘少奇对下乡劳动的中学生说：“你们是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第一代要得便宜的，参加革命我是第一代，现在成为中央委员，第二代、第三代像这样就当不了。”“你们有文化，农民没有……（你们）能当乡、县、省的干部，也可以到中央，那就看各人的本事了。”景山学校完全按照刘少奇的这一套“吃小亏，占大便宜”的“修养术”对学生进行“教育”，说什么：“先当农民，当生产队长，支部书记，再当县长、县委书记……。”把上山下乡当作升官发财、牟取名利的终南捷径。

这种名利思想不仅灌输到学生中，同时在教师里也大肆宣扬、鼓吹。童大林在一次会议上对教师讲：“以后中小学也会有教授的学衔，你们可以根据这个目标，去考虑自己的计划，看多少年后才能达到‘教授’的水平。”他还经常鼓励教师要“在业务上搞出成绩来”，“现在当好一个革命教师，将来可以当教育部长。”要教师“有所建树”，去争取做“红色的朱自清”、“教育专家”等等。为使教师能更好地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驯服工具，他们也在教师中大搞物质刺激。童大林多次主张建立教师的评奖制度，打算设立教师的“奖励资金。”

旧中宣部的阎王们通过上述种种办法，把景山学校办成了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温床。

三、新的科举制度

为了替景山学校的修正主义培养目标服务，旧中宣部的阎王们在这里实行了一套新的“科举制度”。他们通过招生、调班、毕业等手段排斥和打击工农同学，挑选和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这套“科举制”的核心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他们大搞“分数挂帅”、“智育第一”，突出资产阶级政治，培养修正主义的“尖子”，同时摧残和打击大批劳动人民的子弟。

招生是这个科举制度的一道重要关口。景山学校一年级招生简章规定的条件是：(1)智力发展较好，求知欲强，并有良好的生活习惯；(2)身体健康，发育良好，无残病及其他慢性病。在挑选时，又进行初试和复试，严格地挑选所谓“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外貌漂亮”的“理想人物”。此外，景山学校还有一条未列入简章的规定，即绝大部分要收高干子女。童大林在筹办政治班时的一次讲话里，赤裸裸地公开宣扬封建血统论。他说：“要注意阶级成分，最好要革干子女，他们见闻多，受的影响好，家里政治条件好，他们应该是最可靠的接班人，他们的老子老了，他们不接班谁接班？”够了！难道还不清楚吗？培养世袭的“领导干部”，就是这个学校的招生宗旨。

这样，大批“无高贵血统”，“无良好生活习惯”的工农劳动人民子女就被拒于校门以外了。

一九六二年，为了选“尖子”，对报考景山学校的一千三百多名儿童进行了初试和复试，层层选拔，最后录取了一百二十名，其中没有一个工农子弟。

一九六三年，采取了幼儿园保送和学校审查相结合的“尖子里挑尖子”的招生办法，在十一个单位和幼儿园中挑选保送来三百五十九个儿童中录取了一〇九名“尖子”。其中只有两个是工人子女。

几年来，在这里读书的大多是高干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名导演、名作家的子弟。社会上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对这样一个“贵族学校”十分赏识，千方百计要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来。吴晗、林默涵、刘大年、胡绳、姚溱等许多黑帮分子都把自己“血统高贵”的孩子塞了进来。

有的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景山学校，专门买了一架收音机送到幼儿园，规定每天要让他的孩子听广播，好“提高智力”；还有人在入学前两年就开始训练孩子，准备进景山学校。有的家长对招生人员说：“我的孩子聪明，智力发展好，适于上你们学校”，“我的孩子聪明，漂亮，发音好，适合当外交官，你们一定要收下他。”

但是，广大劳动人民却远远望着景山学校的高楼，愤慨地说：“这个学校不是为我们开的！”

景山学校为谁服务，仅从招生工作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景山学校还有一个奇怪的“调班”制度。

一九六〇年，景山学校刚刚由东高房小学和九十一中合并时，工农子弟较多。这些所谓“愚蠢”而又没有“良好生活习惯”的工农子弟被黑帮分子们视若眼中钉，说他们是“教改的阻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包袱”。童大林借口“试验需要”，把学习上的“尖子”挑选出来，组成“实验班”；其余学生也根据“智育第一”的原则，按考试分数，分类编班，美其名曰：“因材施教”。以后每年都根据书本知识和考试成绩，重新调整。六年来，景山学校里已经形成了三种等级班：

(1) 实验班：这是经各班集中挑选，多次淘汰形成的“尖子班”，接受修正主义的“教改实验”。童大林把实验班叫作“宝贝班”，这样的班里，工农子弟极少。

(2) 普通班：由挑选“尖子”后剩余的学生组成，进行“一般”的教育，在

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两道关口赶出学校。

(3)收容班（也被叫做“收破烂班”）。他们把那些所谓“调皮捣蛋”、“学习最差”、“无才无貌”的学生集中在一起，千方百计想办法把这些学生踢出学校。童大林把广大工农学生看作是他的“教改”的“沉重包袱”，因此猖狂叫嚷要“甩包袱”。六年来，被他们用各种手段赶出校门的学生达一千三百多名，其中绝大部分是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女。

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各方面都十分明显。实验班是“宝贝”，是“掌上明珠”，而收容班的学生则受歧视、受欺侮，受迫害。这里，以六(5)、六(6)两个收容班为例。

这两个班共有学生六十八名，绝大部分是工农子女，是原东高房小学的学生。三年级该升到四年级时，全班因为“程度低”而集体留了一级，以后每学期都有从实验班淘汰下来的学生被塞到这个班，有从高年级蹲下来的，也有从低年级拉上来的。有的学生成绩不好，不仅不予留级，反予“跳班”，从四年级跳到六年级，目的是为了把他们早一年甩出学校。现在，这两个班里学生年龄从十二岁到十八岁，学业程度从二年级到六年级。为了早些把他们甩出去，只让他们学习语文，数学，混个及格便“扫地出门”了。

“收容班”学生在政治上备受歧视。“实验班”的学生可以入队、入团，但他们不能。外宾来参观时，实验班的学生便打扮一番在楼下唱歌跳舞；他们却全被关在楼上教室里，连到窗户边去看都不允许。理由是他们“又脏又笨，有碍观瞻”。学校一年一度的“外语晚会”从来不让他们参加，甚至连欢度“十一”“五一”以及自己节日“六一”的政治权利也被剥夺了。有一年“六一”儿童节，领导“恩赐”两张联欢票，并指定要挑“守纪律听话”的学生去，结果挑来挑去挑了一位合格的，可是她已经十七岁半了！

“收容班”学生在劳动上也受到歧视。实验班劳动时多干技术活，如用缝纫机做衣服，装半导体收音机。“收容班”只能干些扫院子、拾煤之类的粗活。他们挣来的钱，学校就化在添置钢琴、手风琴、坐地式收音机、录音机上，为实验班“提高教学水平”服务。当这两个班的工农同学交不起杂费，交不起电影费（为作文指定必看的电影），有的教师要求从中拨款协助解决时，学校却不予批准。

在学习上，待遇也非常不平等。两个“收容班”才配备了四个教师，其中三

个是肝炎病号，教师请病假时便在班上指定程度较高的学生来“代课”，而有的实验班平均每四、五个人就有一个教师，有一个班只有二十九个学生，竟有九个教师。“收容班”学生需要补课，学校不给教室，经多次请求，才拨给两间厕所。这两个班的学生就坐在厕所的尿池边上补了半年的课！

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在学校里抬不起头，回家有时又不被父母理解，精神受到极大摧残。六(6)班一个学生在斗争黑帮分子时控诉道：“进了景山学校后就像掉进了火坑！这里不是我们工农子弟呆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吃着旧社会才会吃到的苦头！实在难受！实在气愤啊！……”

在广大工农学生被打击、排挤、摧残的同时，旧中宣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精心挑选和培养了一些所谓“尖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把这种制度叫做“小宝塔”：底层大，上层尖。这是修正主义的“科举制度”，这是牺牲大多数革命学生，培养一小部分修正主义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制度！

四、修正主义大染缸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培养资本主义复辟的队伍，把教学领域当作争夺青少年的重要阵地。他们打着“教学改革”的幌子，向青少年大肆灌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童大林有一个理论：“先入为主”，“要在儿童幼小的心灵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们究竟在儿童的心灵上画了些什么“最新最美”的图画吧！

景山学校的学生从三年级起，就学起《三字经》，读“人之初，性本善……”，接着就读《四字文》、《幼学琼林》、《论语》、《古文观止》、《三国志》、《纲鉴易知录》、《通鉴选》、《红楼梦》等杂七杂八的货色。

童大林猖狂叫嚣：“说我复古，我就复古！”“《三字经》有政治启蒙作用，可以多识字，能当成小百科全书。”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唯恐同学中毒不深，又提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等早已被唾弃的口号，甚至请来一个教过私塾的老先生，整天领着学生摇头晃脑地吟诵古文。

在教学上，他们还要求教师不加批判地“咬文嚼字地讲”，要求学生不加批

判地“滚瓜烂熟地背”，号召学生大钻古书堆，美其名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其实是把一大批青少年往虎口里送。

同时，他们还把三十年代资产阶级作家的文章捧上了天。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桨声灯影中的秦淮河》、《春》、《匆匆》都被吹捧为现代文学的“经典”，成了小学生必读的范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权威”夏衍等的许多毒草，也大受赏识，硬塞入了小学课本。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下的景山学校，还向青少年大肆灌输反动透顶的洋奴思想。在外语教学中，童大林鼓吹“要让外语教学占领一切阵地”，“要学地地道道的外语”，反复强调要用外籍原著做教材，甚至吹捧《圣经》。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普希金、托尔斯泰的作品都搬上课堂。一九六四年，童大林用外汇买了一大批外国教材，准备选一部分当教科书。这些书的内容是十分反动的，有污蔑斯大林的，甚至有蒋介石、希特勒的狗头像。童大林为了“培养出能直接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外交家”，要求外语教学“全盘西化”，并在学校里建立了两个外语阅览室，要“使人一进去就好像到了外国一样”。外语课上，崇洋思想大为泛滥。更有甚者，童大林之流竟给同学起了外国名字，什么汤姆、杰克、罗伯特、奥列巴，这个“夫”，那个“娜”，乌七八糟，不堪入耳！

景山学校每年还举行一次“外语晚会”，晚会上一律不准说中国话，节目尽是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什么《灰姑娘》、《小红帽》、《州长的厨房》……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和腐朽庸俗的情调，让小小的孩子去演什么公子、王子、美国流氓！

甚至在数理化和史地教学中，也借口“外为中用”，“闯出一条路子来”，大搞日本、德国、法国的教材试验。在“忠于原教材”的口号下，大量兜售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不仅教材用外国的，甚至有的课上还用外语教授，教师不会讲外语，就请外语教师一起上课，一个讲中文，一个讲外文。在中国的课堂上，用祖国语言讲课，却需要翻译，真是荒谬绝伦！大量的外语生词压得同学抬不起头来，整天抱着书本啃，他们却美其名曰“逼上梁山”！

景山学校的课内外教学内容，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位一体的大杂烩，各种毒素，样样俱全。就是不学毛泽东思想！《儿童学现代文》这本教科书中，共有五十篇文章，其中四十篇是朱自清、巴金、茅盾、老舍等人的作

品；毛主席著作只选了八篇，而且都排在后面。就这样还嫌不够，他们生怕毛泽东思想掌握了群众，于是反复警告“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只让学生学习毛主席的“文法”。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其毒也！

在景山学校里，学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被斥为“异端”，愿意与工农相结合被指为“下贱”。写一篇阶级感情强烈、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作文，只能刚刚及格；而写些父母打架、小猫小狗的庸俗文章，却可以得高分。尤为荒唐的是一些腐朽透顶的《论屁》、《偷屎》之类的作文，竟然成了范文，到各班诵读展览，真是无奇不有。

在这样一个修正主义的大染缸里，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腐蚀下，广大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不少人发生了触目惊心的和平演变！

有的学生整天想着如何“成名成家”、“出人头地”，说：“既使我将来成不了科学家，但只要报刊上挂名，说我是个‘科学工作者’这一辈子也知足了。”有的感叹自己“年近弱冠非童子”了，可是“学不成名岂丈夫”？于是就学苏秦的“头悬梁、锥刺股”的方法，发奋苦读，还发明了坐三条腿凳子读书的“妙方”。

有的孩子年纪轻轻就悲观厌世，哀叹“韶光易逝，青春难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有人想寻“世外桃源”，什么“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也成了口头禅。有的人学苏东坡游赤壁，半夜到北海划船，“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在封建思想，士大夫情调的影响下，四五年级的小孩就学会了吟风弄月。下一场小雨，也引得他们诵起“沾衣欲湿杏花雨，拂面不寒杨柳风”来。

受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称赞的文章多是《吃冰棍》、《月夜》、《雪》、《雨》、《风沙》、《月夜游园》、《养花》之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希望，革命的事业，阶级的利益，根本不放在心上。有一个孩子学了《陈情表》之后说：“如果毕业时把我分至外地，我就写一张《新陈情表》，说我祖母有病，要尽番孝心……”

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对青少年产生了恶劣影响，“人性论”、“人类爱”到处泛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孩子们心灵上不断滋长发展，和平演变的情况十分严重。参加外语晚会演出的一同学，开始时与角色的思想感情格格不

入，老演不好；可是经过长期熏陶，潜移默化，到后来就越演越像，与角色融为一体了。曾扮演《灰姑娘》的女同学×××控诉道：经过这种教育，“我对那些资产阶级王子、公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羡慕他们的生活环境，变得贪图安逸，追求享受，情绪消沉。当我听到别人说‘她真像灰姑娘，将来可以当演员’之类的话时，就高兴。我觉得长得美就吃香……。”

由于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长期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有的学生轻视劳动人民，怕艰苦。有一个学生下乡劳动，不吃窝头，两天一夜没吃饭，饿得爬不起来，装病不劳动。一些孩子在城里吃惯了零食，在乡下吃不到，把卫生室带去的喉片吃个精光。有的孩子奢侈浪费严重，家里每顿给三个鸡蛋，吃腻了就往房上扔。还有一个学生，下了狠心，发誓要吃窝头了，就把窝头切成片，抹上黄油，烤得焦焦的，吃了两片。这下子家长乐坏了，兴冲冲地跑到学校来报喜：“我的孩子开始锻炼吃窝头了！”

在这块黑“实验田”里，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精心栽培之下，有的孩子很小就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个十岁的孩子在谈自己的理想时说：“我愿意当个最最出名的人，当个英雄。但是，不像雷锋、王杰那样的，不然死了别人也不知道。我要当个战斗英雄，打死几十个、几百个敌人，但我自己不能死。”另外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说：“我要当我爸爸那样的脑力劳动者”（其父是反动“权威”），很少有学生想当工人、农民。

更为严重的是，有个别孩子为阶级敌人辩护，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却十分反感。老师教他们，他们就围住老师辩论。而这样的学生，正是童大林的心肝宝贝，是他所器重的。

在这种极端反动的教育制度的统治下，学生不但思想上受到了很深的毒害，身体健康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景山学校教学内容比普通学校更加庞杂，更加深奥难懂。教学方法是硬灌、死背，学生负担十分沉重。学生整天忙于繁重的功课，古文背得昏头昏脑，外文单词压得喘不过气来。天刚亮就开始外文早读，半夜三更还在忙数学习题。最重要的毛著学习时间以及体育活动、休息时间都被挤掉了。师生健康逐年恶化。

一九六〇年第一批实验班八十一名同学，患近视眼十一人。当时学生大都六岁。六年以后近视眼急增至三十五人。

由于睡眠不足，不少学生患神经系统病。一九六五年四月调查了一个班（全班学生二十人）。全班睡足八小时的只有三人，不足八小时的十四人，另三人睡眠不足六小时。此二十人中，患有各种各样神经系统病的达十八人，占全班百分之九十！

毕业生健康状况也十分糟糕：

一九六三年五月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体检统计，四十二名毕业生中，因身体条件差受高考科系限制的达三十三人；一九六四年五月毕业生受体检八十四人中，有五十四人受大学科系限制；一九六六年受检六十四人中，受大学科系限制的三十五人。多么触目惊心！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恶！

这一切的一切，也说明被一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控制的景山学校就是要培养学生成自私自利追求个人名利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要培养学生成脱离劳动，脱离劳动人民，高居于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特权阶层；一句话，他们要培养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是旧中宣部以陆定一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铁证！这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从事资本主义复辟罪恶活动的铁证！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被揪出来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被打翻在地了！旧中宣部阎王殿被捣个稀巴烂！景山学校的重重黑幕也被揭开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这个阎王殿的阴暗角落，长期受迫害、受摧残的青少年、革命教师和革命干部纷纷觉醒了，他们起来斗争了！造反了！

旧景山学校，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据点，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实验田也在熊熊的革命烈火中毁灭了。一个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欣欣向荣的新景山学校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

彻底砸烂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摘自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教学批判》编辑组 1967年第3期

【资料】

怵目惊心的和平演变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教学批判》编辑组

国际政治系 60 级 11 名毕业生

我们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愤怒控诉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滔天罪行！我们是国际政治系六〇级毕业生，亲身受到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亲眼看见我们多少阶级兄弟，在推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顽固据点——陆平黑帮统治下的旧北大，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牺牲品。

一九六〇年，我们怀着为革命而学习的壮志豪情，带着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殷切期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北京大学。我们这个班，当时无论从家庭出身还是政治思想状况来看，都是一个很好的班。请看：

家庭出身	工人	贫下中农	市贫	革干	职员	小业主	中农	富裕中农	合计
人数	8人	31人	1人	4人	1人	1人	4人	1人	51人
政治面目	党员 25人				团员 26人		调干 7人		

我们班上绝大多数同学原来都是党团干部，受到党多年的教育和培养，政治觉悟较高。回忆入学初，我们班的情况是何等好啊！那时候，《毛选》四卷刚刚出版，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本宝书，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那时候，国民经济碰到暂时的严重困难，同学们仍然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生活艰苦朴素；那时候，同学们积极走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的道路，在劳动战场上生龙活虎。

但是，在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经过五年的“政治”学习之后，发生了严重的“和平演变”。有的人形成了系统的修正主义观点；有的人严重丧失政治立场，敌我不分；有的人生活道德败坏。全班除一名反革命分子之

外，还有九人受到组织处分，占全班人数的20%。

严重的“和平演变”是怎样发生的呢？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怎样残害青年一代的呢？请看以下的事实吧！

—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主席一贯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服务。早在1957年，毛主席就指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为了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公然和毛主席大唱反调，大肆宣扬培养“红色专家”，特别是在黑《修养》中，反复鼓吹当什么“革命家”呀，什么担当“大任”的大人物呀，千方百计用名利思想来腐蚀青年一代。陆平黑帮忠实地推销刘氏黑货，狂热地鼓吹成名成家，毒害青年。从我们入学的第一天开始，政治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赵宝煦、张侠就利用什么“系主任和同学见面会”，为同学“开开天窗”，向我们灌输名利思想。他们宣扬政治系要培养什么“理论家”、“秀才”、“副部长”、“省地委宣传部长”等等。赵宝煦多次“号召”学生不要辜负“青春年华”，说什么几年、几十年以后“要成为龙种，不要成为跳蚤”。他甚至还赤裸裸地说：“人活一生不能白过，应该留下一些东西”，并指着房梁说：“雕刻这些房梁的人，尽管死去几百年了，但我们现在还能记起他们”，公开贩卖“貂死留皮，人死留名”的货色。他又说：“我系不要培养多了，只要培养出一两个×××式的秀才，就是我们最大的成绩。”他还在学生中公然散布“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剥削阶级糜烂思想，说什么：不用急于谈恋爱，“要搞出成绩来，没有十年八年是不行的，只要搞出成绩来，就有人找上门来。”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秉承其祖师爷刘少奇的意旨，极力引诱学生走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在这种反动思想的影响下，不少人整天钻在古书堆里，对社会上的政治活动不闻不问，埋头苦读，进行所谓“系统的理论学习”。当时有这样一个人顺口溜，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一个书包一个

碗，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成一线，天天来回转。”

在这种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下，一些同学把刘少奇及其徒子徒孙们的话当成“圣旨”，一心想当“红色专家”。有的人扬言要当“中国的女理论家”，“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有的人脱离实际，夸夸其谈“马列主义”词句，得了“小王明”的绰号，不但不感到耻辱，反而自鸣得意，用这个绰号来炫耀自己；有的人每当走过住着冯友兰、冯定等反动“权威”的燕南园，总是啧啧称赞，十分羡慕，说那里是“民族的精华”；有的人把“二十年后能住健斋”（教授、讲师住的地方）作为奋斗目标；还有的人恬不知耻地宣称，只要“专”出成绩来，“四十五岁也可以找到年青漂亮的姑娘”。

为了实现培养“秀才”、“理论家”的目标，为了培养一批修正主义苗子，政治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在学生中物色几个他们认为有培养前途的人，大搞“因材施教”，经常给他们“吃偏饭”，创造各种条件，帮助借阅“内部资料”，亲自给他们修改文章，甚至不惜违反党的纪律，给个别“高材生”透露内部报告。赵宝煦还在我班组织“读书会”，要大家读反动书籍，大写所谓“批判”文章。在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这些“高材生”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上，就走得更远了。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极力鼓吹成名成家，其目的就是为了搞“和平演变”，为了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一句话，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二

陆平黑帮为了推行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了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使出了种种恶毒的手段。

第一、在课程上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引导学生学洋钻古。这就是“三多一少”——古的多，洋的多，反面的多，毛主席著作少。在大学五年中，我们共学了26门课，计2850学时，其中古的占15%，洋的占19%，杂七杂八的知识课程占45%。而毛主席著作学习只有132学时，占7%！即使直接

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程，如“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也是以大量的史料淹没毛泽东思想。如黑帮分子张俊彦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史料讲了两个月，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只讲了一节课时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我们的命根子，林彪同志指示，要用99%的时间来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完全正确的。陆平黑帮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学习“马列主义”不学毛泽东思想，其实质就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马列主义。谁出的坏主意？就是刘少奇！就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的徒子徒孙就是按照他的这条黑指示办理的！

为了实现培养“秀才”“理论家”的目标，原系主任、黑帮分子赵宝煦大力推销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周扬等人那里批发来的黑货，提出一套“二、三、四、五”的要求。这就是“两个过硬”——嘴巴子过硬、笔杆子过硬，根本不提思想过硬；“三个一百”——读一百本书、背一百篇文章、写一百篇文章，根本不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四性”——理论性、系统性、科学性、逻辑性，根本不提革命性、战斗性、阶级性；“五基”——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群众、基层工作能力，根本不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立场和方法，不提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第二，陆平黑帮把讲堂变成牛鬼蛇神放毒的市场，政治讲台讲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而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修正主义的政治。陆平黑帮让很多牛鬼蛇神担任我们的“教师”。五年中担任我们课程的共14名教员，其中有黑帮分子3名，右派分子和有一系列修正主义政治观点的教员4名，共7名，占50%。这些牛鬼蛇神利用讲台，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有一次反动学生王××写了一篇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文章，汉语习作教员乐××(右派分子)便拍手称快，批曰“深刻有力，击中要害。”看！他们的反动气焰何等嚣张！政治学讲师樊××在课堂上鼓吹“单干风”，胡说“包产到户有积极意义”，并声称“毛主席著作十年以后才能讲”。革命学生非常气愤，要求批判他。但政治系党总支书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侠不但不支持，反而胡说什么“好的同学反映好，坏的同学反映坏。”只许牛鬼蛇神放毒，不准革命学生批判！

不仅如此，为了保证贯彻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陆平黑帮大力推行

刘少奇“合二而一”论，大搞阶级调和，庇护牛鬼蛇神的罪恶活动。当刘邓黑司令部刮起了“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以后，六〇级反革命分子李泽成便在班上煽阴风、点鬼火，大搞反革命活动。他妄称要“夺取政权”，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是“三面黑旗”，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帝王专政”，在一些牛鬼蛇神配合下，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风。当时很多革命同学自觉起来向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言行坚决斗争，而赵宝煦、张侠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千方百计地阻挠和压制革命学生的斗争。他们学着刘少奇的腔调，把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胡说成是什么“无原则纠纷”，是“不团结问题”，是“生活问题”。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反革命分子、反动学生漫骂革命学生是“小特务”、“哈巴狗”时，坏分子也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刘少奇的黑《修养》中的指示，诬蔑革命同学对坏分子的斗争是“把什么小事都提到所谓‘原则的高度’，对什么小缺点也要加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大帽子”，说这是“机械地、横暴地、不顾一切地来斗争”，“故意在党内搜索‘斗争对象’，故意制造党内斗争”等等，妄图扑灭革命的火焰。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相结合，在群众斗争中，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才能实现思想革命化。毛主席还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而刘少奇却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早在1948年他就叫嚷：“你们要安心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1964年刘少奇又叫嚷：“当兵两个月可以不当了。不要因参加‘四清’，使学习质量降低。”不仅如此，刘少奇为了使青年脱离社会阶级斗争，关起门来修身养性，以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他的黑《修养》中，还肆意夸大理论学习的作用，说什么“只要虚心努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观察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时候，就一定会比其他同志更敏捷而正确。”还说什么可以“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等等。陆平、赵宝煦黑帮，忠实按照他们的祖师爷刘少奇的黑指示办事，千方百计抗拒毛主席的教育

方针，阻挠和反对革命师生与工农相结合，用旧北大这个修正主义“学府”的围墙，把我们和社会上广大工农群众隔绝开来。他们胡说什么“下乡要有理论，不要着急，现在要好好学习。”胡说什么“在学校也可以实现革命化，劳动化的”。当革命师生冲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罗网，走出校门，下乡下厂下连队时，陆平黑帮便祭起了“组织性”“纪律性”的法宝，对同学的革命行动横加指责和阻拦。《九评》学习以后，广大同学进一步认清革命化劳动化的伟大意义，纷纷要求下乡参加“四清”运动。黑帮分子赵宝煦却说什么“读书也是革命”，“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企图堵死青年学生走革命化的道路。即使我们得到了“合法”的机会下乡参加“四清”，他们也是想方设法用条条修正主义组织纪律的绳索把我们的手足捆绑起来。当时农村中以及工作队内部，两个阶段、两条路线的斗争都十分激烈、十分尖锐，我们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地、富、反、坏、四不清干部和工作队中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黑帮分子竟责令我们“多听少说”，“谦虚再谦虚”，逼迫敢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学生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他们实际上是要我们到农村去当“观察员”，他们多么害怕我们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四

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完完全全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服务的。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60级发生了严重的“和平演变”。那时候，班上购买杂七杂八的古文书籍成风，诵读古文成风，练习写毛笔字成风，念外文、写文章成风，一味追求成名成家。对于身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却熟视无睹，不闻不问。但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必然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修正主义政治。在修正主义的毒害下，一些人政治动摇，敌我不分，丧失立场。有一段时间里，班上反动的政治思想自由泛滥，有的思想反动的学生因为“敢于”大谈特谈三面红旗的“缺点”，而被称为“党性成熟的表现”。

在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相当一部分工农出身的同学由于长期脱离劳动人民、脱离劳动，思想感情逐渐变了，“风度”逐渐变了，慢慢“洋”起来，修起来了。一些同学原来生活艰苦，作风朴实，“土里土气”，也

变得“洋里洋气”了。当放映香港的黄色影片时，便抢着买票；每逢周末舞会，便打扮一番，穿皮鞋，带手表，赶赴舞场；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袭下，60级在道德品质方面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的竟有十来人，占全班的20%！

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残害青年的毒蛇！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罪恶滔天！在它的毒害下，我们班竟有20%的人成为它的牺牲品！

这个20%，是对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无情揭露！这20%的人中，有第一任的党支部副书记，有我们班第一个被发展入党的人，有我们班唯一的“三好学生”，有第一个作为陆平黑帮得意门生分配出去的毕业生！

这20%的人中，不少人在旧社会是在苦水和父母泪水中泡大的，有放牛娃，有“养成工”，有小摆渡工……，在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他们变了，忘本了。有的人身上还留着旧社会的伤疤，竟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安乐王”“社会主义的浪荡公子”；有的人在旧社会当过小摆渡工，患了血吸虫病，是党使他死里回生，竟然完全忘本，丧心病狂地叫嚷要把毕生精力用于“改造”我们党，要“清算”我们党“所犯的种种错误”，叫嚷要退到初级社”“让资本主义抬头来克服困难”……

这20%就是对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最有力的控拆！

我们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后代，我们60级同学，90%是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爱的党，把我们送进北京大学，就是要我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父母，含着热泪送我们进大学，句句嘱咐，字字深情，要我们为革命学习，要我们保卫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江山，使它永不变色，要我们为世界上三分之二还没有解放的人民服务。而万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以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披着羊皮的狼，却要把我们培养成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要引诱我们去捞取个人的名利、地位，妄图让我们背叛革命，走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要让我们这些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后代去当剥削阶级的殉葬品，去当复辟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他们的心是何等的狠毒啊！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根子是谁？毒害我们青年的罪魁祸首是谁？不是别人，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

【资料】

触目惊心的复辟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革命联络站

一、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击工农干部，学生

交大旧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余仁，张华，邓旭初，范祖德之流，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大肆鼓吹什么“老交大传统”，胡说什么“老交大，老就老在老教师开课方面，”“老交大基础课好”，叫嚷“交大必须继承老交大传统”等等。在这个烟幕下，他们大肆吹捧资产阶级“权威”，把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他们给这些反动“权威”种种特权，为教授配备助手，并且助手要“好用”，“不便随意调动”，为了拍这些“权威”的马屁，余仁之流还特地为这些臭“权威”拜年祝寿。余仁这个老混蛋为了照顾周志宏的个人兴趣，竟不顾国家计划，抵制国防科委要七系某专业下马的决定。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资产阶级“学者”原一系系主任李永庆死了，交大黑党委竟组织党委书记，总支书记一直到学生的大队人马，为其号哭送葬，甘心情愿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与此相反，余仁之流对于广大工农干部，使尽了打击、迫害、排挤等卑鄙手腕。如：现一系办公室主任田修同志，是一个工农干部，他工作任劳任怨，踏踏实实，但他进交大十五年，工作竟被调动二十余次，工资也一直没有调整过。复员转业军人是交大革命左派队伍中的骨干力量，而校黑党委把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批批地把他们赶出校门。59年我校调来390名复原军人，这些人大都是工农子弟，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觉悟高，干劲足，但是余仁、张华、邓旭初等眼里，他们没有“权威”吃得开，没有“教授”们的水平高，因此他们来校后象工具一样地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意使用。今天调去挖挖土，明天调去烧烧饭，东调西调。最后，到了62年余仁之流觉得这些人已成为他们的“包袱”了，于是一声令下，全部离校。有些同志不肯走，他们就污蔑这些同志“光吃饭不干事”，“象菩萨一样供着”等等。十分恶毒，结果，全部被他们赶出校门，真是卑鄙之极！

交大黑党委如此狂热地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如此疯狂地排挤、打击、迫

害工农干部、复转军人。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根本不是！“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余仁、张华、邓旭初，范祖德等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爱和憎，表明了他们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是一丘之貉。他们鼓吹的“老交大传统”，实际上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交大结的一只苦瓜。所谓“老交大传统”实际上是“教授治校”的翻版，余仁之流就是打着发扬“老交大传统”的幌子，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

二、阴谋篡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人们可以对余仁之流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举出一千条一万条的罪行来，但根本一条就是他们阴谋篡权，对广大革命师生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修正主义教育黑纲领《高教六十条》出笼以后，他们以为资产阶级的“一长制领导”“教育治校”的时机已到，于是就公开叫嚣反对党的领导，勾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一大批牛鬼蛇神塞进了校务委员会，掌握了招生、分配、教学、行政的大权，让这批混蛋们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更露骨的是，《高教六十条》下达之后，交大黑党委亲自制订了《交大十七条》，两者比较起来后者更有发展甚至给予校务委员会任免大权。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大学的人事任免大权要由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来掌握吗？难道无产阶级要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吗？

与此同时，一大批漏网右派、牛鬼蛇神被捧上了副校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各级领导的宝座。据不完全统计，在担任各系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副主任的186人中，教授占了20.1%，讲师占45.7%其中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占46.2%，而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的仅占9.1%，教育大权究竟在谁手里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余仁之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要业务上有一套的人担任，这样才能压得住阵”。在他们的庇护下，漏网大右派陈石英被捧上了校长的“宝座”，资本家李太云被捧上了“八系系主任的宝座”；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程福秀，被捧上了六系系主任的宝座；大右派莫善祥摘掉帽子后立即提升为教研部主任，六四年还通报全校表扬……这批牛鬼蛇神上台后确实为余仁、张华、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压了阵，维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

三、培养了资产阶级接班人

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大事。毛主席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而交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余仁、张华、邓旭初、范祖德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根本无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把培养接班人的大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批坏家伙对新生力量与又红又专的人才拼命压制、打击。余仁这个老混蛋采取“卡两头”的卑鄙方法，胡说什么“讲师以上开课要经过校长的批准，新助教开课要经过教务处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范祖德竟说“不要阿狗阿猫都拉上去讲课。”他们让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操纵了青年教师的生杀大权，胡说什么“较大规模考核青年教师是一个创举，步步考，逐步形成考风”。

“青年教师的考核试题应由教研组主任出、教授出。”疯狂鼓吹“业务至上”“理论第一”，使得一部分青年教师投入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怀中，形成所谓实力派，培养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此相反，那些真正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的青年教师，却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抬不起头来，这些同志气愤地控诉到：“交大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

交大黑党委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交大大肆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的篡权打下社会基础。他们制订了“重点培养的骨干教师”，炮制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培养教师十年规划”。

这个“重点培养的骨干教师”共有五十九名，其中教授讲师共52名；剥削阶级出身的34名。这些人大都是余仁，张华亲自点名的所谓“业务拔尖”的人物。这59名重点培养的“骨干教师”中包括张寿、何友声这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凤初、李学道式的叛国分子，胡善荣、秦士元式的白专人才；谢广祥等那样的“修养”的忠实信徒。

对这些重点培养的人才，余仁、张华等特别强调“学校要为他们寻找道路提供方便”，要“下决心减退他们的行政、教学与社会工作，使他们每周保证有三分之一的工作日用于进修”，叫嚷“业务上冒尖的应给予特别注意”，“必要时还可以抽出来脱产或半脱产进修”，这跟刘少奇鼓吹的“为了培养专家，可以不

让他入党，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谬论是同出一辙。由此可见，余仁、张华之流跟他们的主子是何等的紧啊！

所谓“培养师资十年规划”具体内容究竟是些什么呢？这看下表：

年度 人数 职务	共计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963	1179	58	4.9%	48	4.1%	215	18.2%	358	72.8%
1972	1278	82	6.4%	203	15.8%	815	63.8%	178	13.9%

由表清楚地看出，这个发展计划实质就是“向教授，副教授进军”就是要培养更多的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四、猖狂反党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对派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与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毛主席又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而我校的牛鬼蛇神则利用教课来进行反党活动。

编写教材是关系到培养哪个阶级接班人的大事。教材编审工作理应由政治觉悟高的人员来担任。可是交大旧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顽固坚持教材编审工作应由“学术水平较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来干，再三叫嚷“要注意总结国外有关经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旧党委把我校王公衡、凌渭民、曾继铎、程福秀、夏安世、李勃仲等一大批牛鬼蛇神塞进了教材编审委员会，而讲师只能担任秘书工作，助教则根本跨不进编审委员会的门槛。据初步统计，我校担任教材编审委员会工作中的人中，教授，副教授占 53.3%，其中剥削阶级出身的占 52.7%。象凌渭民这样的漏网大右派，有关单位曾多次提出不能让他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但是余仁，张华之流，仍然把他塞进了编审委员会。

这些牛鬼蛇神掌握了编审大权后，即向党猖狂进攻。他们所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全面否定 58 年大跃进时革命学生自编教材。而把“帝”“资”“修”的一

套破烂货塞进了教材中。他们所鼓吹的是“教授创造世界”，“惟有读书高”的反动谬论。这批混蛋利欲熏心，为了猎取稿费，教材搞的多而繁，严重脱离实际。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凌渭民利用盘踞的主编英文教材的大权。大肆放毒，向党猖狂进攻。在他编审的外文书中，外文例句都是些什么“解放以后阶级就不存在了”，什么“在困难年月里，整个省遭受灾荒”，什么“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得到了奖金”什么，“XX省发生灾荒，心里很沉痛”等等。大肆鼓吹阶级熄灭论，宣扬物资刺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凌渭民疯狂叫嚣“政治文章学不到什么东西，主席译文中有很多错误”，以此来抵制反对主席著作作为外文教材。对于这样一个反动分子，群众多次提出要求批判，交大黑党委却长期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委其重任，让他担任国防科委英语班主讲，教授解放军。这样进一步暴露了余仁、张华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狰狞面目。

看了以上触目惊心的复辟事实，我们体会到，旧高等院校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据点，是培养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温床。

余仁、张华之流鼓吹的所谓“老交大传统”是修正主义教育在交大结的一只苦瓜，我们一定要从苦瓜摸黑藤，顺着黑藤摸黑根，这黑藤就是范祖德。邓旭初、张华、余仁等直至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这黑根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伟大号召：“学生就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一定要批臭批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臭、斗垮、斗倒刘少奇、陆定一、余仁、张华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交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选自《教育革命通讯》1967年第6期

【资料】

《高教六十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保护伞”

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革命委员会

斗批改办公室 五、七战斗团

解放以后，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前的17年中，在教育界，长期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着，中国赫鲁晓夫则是他们的总后台。《高教六十条》，就是他们在高等教育界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

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旧思想体系在工人阶级内部最集中的代表者和最顽固的维护者。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两者是一路货色。所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他们必然地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其主要的依靠对象，依靠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因此《高教六十条》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保护伞”。

反对思想改造，鼓励走白专道路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们国家建立。资产阶级已经被推翻。然而，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上已经失败了，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有一定的市场。“他们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这种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代表者。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毛主席又强调说：“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必须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

但是，《高教六十条》则相反，竭力鼓吹白专道路，培养精神贵族。《高教六十条》大肆宣扬“业务第一”，宣扬“政治服从于业务”的资产阶级观点，《高

教六十条》中第六条上说：“高等学校师生的红，不但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应该表现在他们教学和学习的实际行动中。”意思就是说，知识分子不用思想改造了，只要把“关门教学”和“关门读书”搞好就行了。在这里，阶级斗争被取消了；“关门教学”、“关门读书”，被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里，《高教六十条》执行的就是刘少奇所贩卖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黑货。

《高教六十条》的炮制者，唯恐他们鼓吹的白专道路不能实现，绞尽脑汁来反对无产阶级政治。

他们抛出一条又一条的清规戒律，来限制和排挤无产阶级政治。他们规定，“必须以教学为主”，“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都必须“安排得当，以利教学”，“在学校中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活动，要做妥善安排，不妨碍教学计划的完成。”“每学年应该有八个月以上的时间用于教学。”

他们还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种种保证，要求“切实保证教师的业务工作时间，严格执行中央关于保证知识分子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业务工作上的决定。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应该根据自愿原则，学习时间不做硬性规定，党、团、工会的会议和社会活动，在通常情况下，应该控制在六分之一的工作日内。”注意，在所谓“业务”工作上“切实保证”，在政治理论的学习则是“自愿”，党、团、工会的会议和活动，则是“控制在六分之一的工作日内。”这岂不是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拒绝思想改造发了“通行证”吗？

他们还硬性规定，要求学生“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学好功课。”而且要学生“尊敬师长。”在《高教六十条》刚出笼时，“活阎王”陆定一在一次讲话中为这个规定作了一个注解，他说：“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哪怕他们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也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就是说，一定要青年学生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如果有谁敢违犯，《高教六十条》上又规定了一条，就是：“对于学习成绩低劣，不宜在校继续学习的学生应该令其退学。”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多么可恶啊！凡是敢于造反，不受“清规”的学生，就要勒令“退学”，真是岂有此理！

推销教授治校的黑货

1958年8月，毛主席在视察天津大学时，指示：“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里毛主席特别强调党委领导，把党委领导放在高等学校工作的首位，就是要保证无产阶级对学校的绝对领导权。只有保证无产阶级对学校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学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服务。

《高教六十条》的炮制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把矛头直接指向党委领导这一条，把早已抛进历史垃圾堆的右派分子提出的“教授治校”这个反动主张，当作“宝贝”重新拣了起来。

他们用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一长制，代替党委集体领导。《高教六十条》规定：“高等学校校长是国家认定的学校行政负责人，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校务委员会和学校经常工作。”这样，校长，就在“国家任命”这样的头衔下，变成了高于一切的统治者。究竟，校务委员会又是什么东西？根据规定：“高等学校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教务长、总务长、系主任，若干教授和其他必要人员组成，校务委员会的人数不宜过多，党外人士一般应该不少于三分之一”，从实际情况来看，校务委员会差不多全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组成和操纵的。

他们还不满足，还怕校务委员会不能调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做了许多规定，给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种种权利。于是又规定：“学校党组织一定要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善于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进行工作。”在这里，绝口不提加强思想改造的问题，不提阶级斗争，只有什么“合作”、“商量”、“听取意见”、“调动积极性”。也就是要学校党组织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牵着鼻子走。

《高教六十条》又规定：“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教师”，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说：“学校内决定一切的问题是教员。”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叫嚷说：“右派教师也可以起主导作用。”竟然丧心病狂地要让右派分子来统治学校，毒害青年。规定：“研究生都要有指导教师和具体培养计划，指导教师由学术水平较高的教师担任”；“学校应该为一部分学术造诣较深的教授，配备研究工作的助手，助手不能随便调动。”把这些所谓“学术水平较高”、“学术造诣较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让他们带研究生，给他们配“助手”，

而且还不许“随便调动”，而学校党委则必须“教育党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同学完成学习任务。”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简直成了“太上皇”，成了高等学校的“主宰”，他们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而无产阶级则只能跪倒在他们脚下，任凭他们宰割。

解放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高等学校仍然保持了特殊的统治者的地位，《高教六十条》则用“法令”的形式继续巩固和加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地位。《九评》上指出：“赫鲁晓夫所追求的只是苏联特权阶层分子，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美好生活’，这些人侵吞了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他们的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化了。”《高教六十条》所追求的也正是赫秃的那一套。请看第30条的规定：“教学以外的业务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除学校统一规定的重大政治活动以外，由教师自己支配，不实行上下班制度”，“建立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轮流休假制度；使他们能够在一段集中的时间从事进修，科学研究或者其他工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确够逍遥，他们“不实行上下班制度”，他们在正常的寒暑假和国家规定的假日外，还有专门的“轮流休假制度”，这还不算，在第43条中还规定：“职工中，要树立为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服务，为全校师生员工服务的思想”，这句话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说规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自由游荡还不行，还要有人去伺候他们。在“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幌子下，让职工去当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仆役。

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高教六十条》则大唱反调，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什么“积极发展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必须提倡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发展。”

因此，“在教学大纲中规定介绍各重要学派的观点，必要时，还可以分别开设介绍不同学派的课程”。“在文科要创造条件，在高年级开始介绍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等课程。”（就是让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由泛滥）“学校要根据教学需要和教师的专长在高年级开设选修课程。”“教师可以讲授自己的学术

见解”，“不对教师按何种学术观点讲课作出规定。”荒谬地提出：“不要过分强调结合专业和勉强联系当前实际。”

以上种种，完全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的那一套东西，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旧大学的一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知识”是一种商品。所谓“教授”、“学者”、“名流”为了招揽顾客，就巧立名目、故弄玄虚。因此“学派”很多；教师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乱讲一气，美其名曰“不同的学术见解”。林彪副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把教育当营业，故弄玄虚，拖长时间，抬高价格。”《高教六十条》宣扬的就是这一套资产阶级的破烂货，他们害怕这一套行不通，因此，又作出一条黑规定：“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必须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之间的界限，政治问题又必须严格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也不许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这里把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讲得非常玄妙，似乎与政治问题是漠不相关的问题。其实不然，说穿了，这不过是彭真的《二月提纲》中提出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同义语而已。其目的就是要保证资产阶级思想通行无阻，不许无产阶级对它进行批判斗争。活阎王陆定一叫嚣：“现在要‘两个传下去’，马列主义传下去，资产阶级思想也传下去。有‘两个万岁’，马列主义万岁；资产阶级思想也万岁。”这一段话，就赤裸裸地道出了《高教六十条》的罪恶目的。

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向我们发出伟大的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号召，宣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死刑，宣判了修正主义教育纲领《高教六十条》的死刑，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前进吧！

——摘自《教育革命》第九期 1967年10月27日

【资料】

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职业教育情况介绍

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革命委员会

斗批改办公室

为了适应工业生产中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利润，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企业主迫切需要有一定文化技术水平为他们效劳的技术工人，这些工人的培养是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职业教育来完成的。

资产阶级宣扬什么“学校可以脱离政治”的理论，其实，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列宁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总是“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他们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训练恭顺的能干的奴才，训练“资本家的走卒和奴隶”，他们的“职业教育”也是如此。

下面，简介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职业教育情况。

美国：为资本家培养熟练工人

美国的职业教育包括职业技术教育、农业职业教育和商业职业教育，目的为工、农、商培养熟练工人。

他们的方法为通过各地职业学校和学习期限不定的训练班进行。在职校的年岁通常14—18岁的青年，全日学习，训练班的是在生产部门工作的而只用部分时间提高业务能力的人。在50—56年每年约300万人受这种教育。领导权、经费、招生数额控制在反动的联邦政府手里。英国：英国的职业教育直接在企业里进行，一种叫“学徒”制的生产教育制度是培养熟练工人的主要途径。招生对象是中学毕业的十五六岁的男女青年，此外，还有技术中学和工读交替制训练班，学员每年用五六个月的时间学习理论课，六、七个月的时间在生产部门劳动。英国政府和企业主操纵大权。

法国：徒工学校是进行职业教育的一种普通方法。这些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经

过入学考试的年满14岁的青少年。58年被统治的这类学生有29万人左右。另外，生产部门设有专业班进行职业教育，这类学校共有30万人。

在西德、意大利、日本、比利时等国也实施这种教育。

苏修教育点滴：卢布挂帅分数第一

在苏联，助学金的高低由分数来决定。有两门3分的不给，4—5分的给3卢布，全5分的45卢布。在这套方法毒害下几乎百分之百的学生在考试时弄虚作假，甚至使用现代化器材——照相胶卷，老师也视而不见。“

等级制，升官图：在苏联，一般的工人农民甚至大学生都不能算是“人”，只有研究生经过许多次答辩后才算为“人”，可见，工农群众在那些特权阶层眼里不过是会说话的牛马而已，这就是苏联的本质。

为了做人，大学生一进校门就去求师，与教研室订合同，作出的成果是教员的，在教员能够平步青云时，学生才可以一帆风顺。学生若违背老师的观点则视为大逆不道，非开除不可。

——摘自《教育革命》第九期1967年10月27日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